

# 記 憶

REMEMBRANCE

2008 年 12 月 28 日

第十期

2008 年 9 月 13 日创刊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革研究

---

## 本期目录

### 国史笔谈

[何 蜀](#) 新松恨不高千尺——读《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求疵札记

### 早期红卫兵专题

[阎阳生](#) 清华附中红卫兵 100 天（史林一叶）

[卜伟华](#) 阎阳生《清华附中红卫兵 100 天》若干史实辨正（闲读偶记）

[刘 双](#) 毛泽东对联动之捉与放（史林一叶）

[董胜利](#) 关于西安红色恐怖队的口述回忆（蓦然回首）

[陈益南](#) 我见过的“红色政权保卫军”（文摘）

### 文摘

[陈冀德](#) “阴谋文艺”遭遇阴谋记——《朝霞》事件

### 编读往来

[年终寄语](#)

### 2008 年分类总目录

[《记忆》1—10 期](#)

---

### 【国史笔谈】

## 新松恨不高千尺

——读《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求疵札记

## 何 蜀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几十年来，大陆官方审定出版的文革“正史”，只有薄薄的一本《“文化大革命”简史》，而这本《简史》的两位作者之一的金春明教授独立写作的另一部《“文化大革命”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9 月第一版），竟在官方查禁之列。现在终于又出版了一套由学者独立写作的包括文化大革命时期历史在内的国史，确是令人高兴的。

对于这套国史的第八卷《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以下简称《难》），《记忆》此前发表的丁东和阎长贵两文已经作了充分的肯定，这方面笔者就不多说了。《难》的两位作者，一位是老朋友，另一位虽无联系交往，但也应算是同道。“君子交有义，不必常相从。”以文会友，还是直说一点吹毛求疵的意见吧，以利于相互切磋，促进文革史的研究和写作。

### 上层与下层

官方审定出版的那本《“文化大革命”简史》，曾被徐友渔指责为“帝王将相史”。此说虽然有些刺耳，但是确实道出了一个官史的通病，即过多注重领袖人物及执政党中央的决策与运作，以及高层人物间的争斗，此风愈演愈烈，以致现在许多地方党史甚至地方史都变成了执政党的会议史、决议史、文件史。而香港中文大学这套国史，按总序所说已“开始注意到支配社会行动的普遍观念与重大社会事件的互动，特别是这些事件如何从中央决策到地方，再到基层展开的”。本卷作者在导言中也认为：上层与下层“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对立，不同时期不同层面，联系与对立侧重不同，从这个角度反思‘文革’显然要困难得多。但舍此无法理解这场政治运动为什么确实是‘史无前例’而有那么多民众大规模参与，为什么导致政局的长期动荡不休而欲罢不能。”

不过，看一看全书的章节结构，就会知道作者离自己设定的这个目标还有一些距离。全书共分十章：

第一章，林彪事件后的中国政局；

第二章，中美关系缓和与中国外交战略的变化；

第三章，毛泽东在选择新的接班人中寻求平衡；

第四章，“抓革命、促生产”模式下中国经济的跌宕起伏；

第五章，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与批林批孔运动；

第六章，围绕四届全国人大的斗争；

第七章，动荡中的社会、文化与思潮；

第八章，不摸脉的邓小平 1975 年整顿；

第九章，“批邓”把民众推向公开造反；

第十章，“下不为例”的粉碎“四人帮”；

从这十章及各节的标题设置即可看到，除了第一章（主要是第一节“林彪事件的扩散、传达激起强烈的社会反应”和第二节“怀疑文化大革命的社会思潮崛起”）、第四章（主要是第四节“‘农业学大寨’压迫下的 1970 年代前期农村经济”）、第五章第三节（主要是第一小节“各地重新掀起造反浪潮……”部分）、第九章（主要是第三节“‘四五’运动：真正的群众造反”）写到一些下层社会情况外，只有第七章基本上是以整章篇幅较多地反映了下层的“社会、文化与思潮”。其他各章都是写上层（而且主要是写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四人帮”等很少几个人之间）的决策与争斗。像“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这样的内容，纯属高层权力斗争与领袖谋略问题，单独列入一章的标题中，是否显得过重？

此外，作者在书中特别写了一些“带有专题性的考证”，据作者在导言中举出的有：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曾经考虑过哪些人当接班人？

周恩来为什么要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做痛苦的历史反省？

江青、张春桥历史上是叛徒吗？

中国与阿尔巴尼亚、越南先后翻脸的原因是什么？

谭甫仁中将被刺杀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少将为什么被逼死？

公安部长李震少将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

毛泽东有没有因《红都女皇》事件而要把江青撵出政治局？

周恩来对美国人到底说了些什么而被毛泽东下令批判？

八大军区司令对调是要防备谁？

批林批孔是毛泽东还是“四人帮”发动的？

邓小平的 1975 年整顿是不摸脉还是不想摸脉？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泽东的决策还是“四人帮”的挑拨？

“一生中做了两件大事”是毛泽东的政治遗嘱吗？

谁是粉碎“四人帮”的首倡者？

“按既定方针办”是“四人帮”的阴谋伪造吗？

中央政治局里有多少委员参与和预知了抓“四人帮”的行动？

从作者重点列出的这十七个问题（或者说专题）看，除了谭甫仁被刺杀一案涉及下层社会原因（书中对此有所论述）外，全是高层“宫廷斗争”的内容。由此也可看出作者关注的重心所在。

其实，同样是这些问题，如果作者能把视角转移一下，多关注一些下层，是可以找到另一些值得记叙和论述的专题的，比如，在最革命的“大好形势”下，“走后门”之类“不正之风”怎么竟会泛滥成灾引起极大民愤？为什么在反对“走后门”问题上民众与毛泽东想不到一起？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给各地的社会局势和民众的政治生态带来什么影响？为什么批林批孔几乎引起新的造反运动却又未能像文革前期那样有众多民众参与？为什么民众在那几年里对“政治谣言”的传播和炮制会有那样大的兴趣？等等。

此外，书中称“谭甫仁中将”、“王良恩少将”、“李震少将”，都不妥当，因文革之前一年已经取消军衔。王良恩和李震两人之死属于同一类型（都是高层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作为两个专题，似嫌重复。文革中高级将领之死，是可以找出另外一些更能反映时代风云的专题的，比如同样有过少将军衔的吴自立，文革前就因组织编写《平江革命斗争史》和领衔创作电影剧本《怒潮》而被认定是为彭德怀翻案，是“反党”（其专案调查组由贺龙负责），被撤销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职务。文革中，因支持得到“无产阶级司令部”肯定的湖南造反派湘江风雷，甚至一度住在湘江风雷一派的武斗组织青年近卫军总部“帮助指挥”（参见陈益南回忆录《青春无痕——一个造反派工人的十年文革》，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6 年出版），又被周恩来斥为“黑手”（与他同时被打成“黑手”的还有另一位同样有过少将军衔的老红军蔡爱卿），遭到反复揪斗、关押审查后，于 1975 年含冤去世。吴自立的命运，应该是更能反映出当代国史而不仅仅是高层权力斗

争史的一些侧面的。

## “大革文化命”与文艺史

文化大革命又被称为“大革文化命”，它从毛泽东委托（毛十分诡谲地强加于人，称之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并亲自改定其《纪要》的发表从而展开文艺大批判开始，文艺领域成为文革中首先遭难并饱受摧残的重灾区。但在《难》中，涉及该历史时期文艺状况的，只有第七章第一节中的第二小节“官方创作理论体系控制下的极端政治化文化”和第二节中的第三小节“‘文革’后期的地下文学”。这也许与两位作者分别专长于对外交史和经济史的研究而对文艺史的研究相对较少有关。不过，作为一部完整的国史，还是应该对各个不同领域的历史情况都有足够篇幅的记叙和论述，轻重不宜相差太悬殊。因为对文艺方面着笔太少，所以在《难》中不易看出从批林到批邓的五年间文艺方面起伏演变的历史脉络和走向。

作者在这一章里，自拟了一个不准确的概念：“红卫兵文化”。作者说：“‘文革’头三年，包括文学、电影、绘画、诗歌等等旧文化几乎都被砸烂，代之而起的是造反派组织的群众运动文化，我们将其称为红卫兵文化。”（442页）其实，作者既已说了这是“造反派组织的群众运动文化”，何必又去另造一个“红卫兵文化”的概念呢？这一概念显然不如前一个概念更清晰、准确。因为对“红卫兵”一词是可以有不同理解的——可以理解为各类红卫兵的总称，也可以理解为1966年“红八月”横行京城、首开打、砸、抢、抄、抓甚至滥杀无辜之风（而且后来并未被当作“三种人”清理）的那批干部子弟“老红卫兵”（即“联动”一派）。也可以理解为以首都高校“五大领袖”为代表的造反派红卫兵，还可以理解为后来成为学校中取代共青团组织的官办“群团组织”红卫兵。但不管如何理解，它们都有一个不容改变的内涵：学生。这个概念显然不能包括工人、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干部、科技工作者、各类学校教职员工、财贸系统职工、军事院校学员、部队文体单位人员、开展“四大”的军区机关指战员、农民、街道居民等等不同社会阶层中的造反派。提到文化大革命就只想到红卫兵，只知道红卫兵，那是一些外国人的简单思维，作为中国人写自己的国史，用不着去迎合外国人的思维习惯。

## 《艳阳天》还是《金光大道》？

《难》的第七章第一节第二小节中讲到“当时最有代表性的小说、诗歌、文学理论”时，分别列举了这三个方面的三部代表作品：浩然著长篇小说《金光大道》，张永枚著诗报告《西沙之战》，郭沫若著《李白与杜甫》，但是，作者在介绍《金光大道》时，却不知怎么把内容介绍成了浩然的另一部长篇小说《艳阳天》了。在介绍了浩然的简历和《艳阳天》前两部内容后，作者说：“1971年出版了《艳阳天》第三部《金光大道》，成为‘文革’时期绝无仅有的巨幅作品。”“这部小说的阶级斗争模式表现得更加清晰……”并提到“萧长春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力量”、“阶级异己分子、农业社副主任马之悦（即走资派的前身）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势力”、“地主马小辫”……最后说：小说因语言的乡土特色和时代生活气息等“使得《艳阳天》在‘文革’时期模式作品之中，超出了一般机械的简单教条图解生活的方式，在当时文学百花凋零的情况下，还是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

（447—448页）

读了书中的这些介绍，凡是读过浩然这两部小说或看过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的人都会感到莫名其妙。讲《金光大道》怎么会扯到萧长春了？《金光大道》的主角是高大泉呀！——后来人们正是根据“高大泉”这个名字的谐音评论文革时期文艺作品中的“英雄人物”都是“高、大、全”，浩然对此还颇为得意，认为“我觉得很有道理，把我的作品深化了。”（浩然《我的人生：浩然口述自传》，北京，华艺出版社2000年10月第一版275页）而且，《金光大道》怎么会成了《艳阳天》的第三部？《艳阳天》是浩然创作于文革前的作品，小说三卷（不是三部）分别于1964年9月（作家出版社）、1966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而《金光大道》是浩然在文革中从1971年开始创作（直到文革结束后才完成）的作品，第一、二部分别在1972、1974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第三部曾在1976年6月《人民文学》选载。1994年8月，《金光大道》全四部才由京华出版社出版发行。在《难》这样一部国史中，对一部小说花了超出一页的900多字的笔墨来进行介绍，本身就已经有些欠妥，更何况又把内容完全介绍错了。这样的疏忽显然是不应有的。

## 关于户县农民画

在谈到美术方面情况时，《难》着重介绍了陕西户县农民画。也用了超出一页的 900 余字篇幅讲“值得一提的是陕西户县农民画的崛起”（450 页）。然而，在这样大的篇幅中，却看不到作者对这个在百花凋零的文革中“崛起”的畸形美术现象进行认真的研究和反思，而是基本上采用了文革时期的宣传报道材料，对其进行片面的讴歌。其实，只需稍稍想一想，就应该明白，在文革风暴摧残文艺百花园地之后，在当局不断发动“反复辟”、“批黑画”的风刀霜剑严相逼之下，能“崛起”一批农民画，是正常的现象吗？就在户县农艺画在北京展出（1973 年 10 月 1 日至 11 月 15 日）和喉舌媒体大肆炒作的时候，评法批儒运动正在全国展开，江青等人为两位土耳其音乐家访华演出的曲目选择问题挑起一场批判“无标题音乐”的闹剧，毛远新按照“四人帮”的指示在辽宁布置批判小说《生命》（发表于 1972 年沈阳《工农兵文艺》创刊号），江青等人还相继发起了批“黑画”和批判意大利著名电影导演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

特别是在“批黑画”恶浪中，陕西省的著名画家、“长安画派”代表人物石鲁，再次遭到批判。本来在此之前，为了能让陕西省拿得出参加全国美展的像样作品，陕西省革委不得不将已经被打倒多年的“黑画家”石鲁“解放”出来，任命为省革委文化组美术顾问，但是，在“批黑画”恶浪中，陕西省再次将石鲁抛出作为批判靶子，同时遭到批判的还有二十多位老画家，如赵望云（其画作被斥为“黑山黑水”、“歪曲和丑化社会主义现实”）、何海霞（其画作《严陵月色》题词“与石鲁、李琦月夜泛舟……”被斥为“借以寄托他们对文艺黑线及黑线统治下昔日盛事的无限眷恋之情”）、方济众（画延安的画作也挨批）、叶访樵（所画花卉下一怪石被说成像蒋介石的头，斥为“为独夫民贼蒋介石招魂”）、郑乃珖（所画石下一鸡，被诠释为“危鸡（机）四伏”，斥为“林彪反党集团恶毒诬蔑大好形势的反革命谣言的形象图解”）等。省革委还调集了西安大专院校政治、文学、历史、美术等方面的数十人，对石鲁“黑画”进行批注，编出一大本《石鲁反动字画批注》，举办了批判石鲁“黑画”的专题内部展览，省报连续发表了二十多篇批判文章，并在西安人民剧院召开了“深批克己复礼痛击美术战线文艺黑线回潮”的大会，狠批“文艺黑线回潮的急先锋、黑画家”石鲁……（张毅《石鲁传》，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1 年 1 月第一版 329—337 页）就是这同一个省

革委，在这同一时期，将户县农民画作为其政绩和文化大革命“丰硕成果”的体现大肆炒作，这不是值得认真研究的吗？

在段景礼著《户县农民画沉浮录》（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5 年出版）一书中，对户县农民画如何“在‘为政治服务’中成长”，如何得到政治和艺术的双重“辅导”，如何举办“阶级斗争展览”，如何“从‘红画兵’到‘学习班’”以及“‘红画兵’批‘黑画’”等等，都有详细的调查和冷静的反思。然而，这些在《难》的这部分内容里，却一点也看不到。而《难》这套国史是定位于“从某一种意识形态中走出来，尽可能价值中立地审视过去，达到反思的高度”的（见金观涛《总序》），这显然有违作者和编者筹划这套国史写作时的初衷。

### 《一只绣花鞋》还是《一双绣花鞋》？

在第七章第二节第三小节，谈到文革后期的地下文学中的“民间流传手抄本小说”时，《难》着重介绍了《第二次握手》和《一只绣花鞋》两本书。令人不解的是对《一只绣花鞋》的介绍。因为此书近年曾引起一桩轰动一时的文坛公案。

众所周知，文革时期流行的手抄本是《一双绣花鞋》，不是“一只”而是“一双”，作者是原重庆化工局干部况浩文（后为重庆市外贸局长），1958 年，况浩文根据他在公安部门的工作（主要是在中共执政初期参加“镇压反革命”运动）的经历，写成了中篇小说《在茫茫的夜色后面》，投稿给重庆出版社，不幸责任编辑王文琛被打成了右派，无人处理此稿。况又把稿子投到了《成都晚报》。《成都晚报》主编陈柏林、副刊组长林开甲都在重庆工作过，一致认为作品故事生动，文笔不错，特请老作家沙汀审读。沙汀读后也很感兴趣，还请四川省公安厅副厅长秦传厚看看，从公安政策、保密规定等方面把把关。此稿被峨眉电影制片厂得知，导演张波与况浩文联系，邀其改编为电影剧本。后因峨影厂“下马”，张波调珠江电影制片厂，又从珠影厂向况约稿，并找重庆市长任白戈给况批了创作假。剧本改好后由重庆市文联打印了 70 份。重庆著名评书艺术家徐勍看到后，建议改名为《一双绣花鞋》并编成评书。但此时正遇上贯彻毛泽东对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说评书与拍电影都被迫“下马”。但故事却在川东民间广为流传，文革爆发后，此稿被批判为“毒草”，况浩文为此吃尽苦头，重庆文联有关干部也因“扩散毒草”问题遭到追查。但是越批判越引起人们的兴趣，因此《一双绣花鞋》又



变成了手抄本在民间流传。文革结束后，重庆文联《红岩》杂志复刊，第一期即推出电影文学剧本《在茫茫的夜色后面》。1980年，珠江电影制片厂将其拍成电影，定名为《雾都茫茫》，该剧还被改编为话剧和川剧等十多个剧种演出。

不料，2000年9月，被标榜为“中国当代恐怖小说先驱”的《一只绣花鞋》在书商的大肆炒作下出版，作者张宝瑞被称为文革时期手抄本文学代表作家之一。著名诗人汪国真在为该书所写的序中称：“知名作家张宝瑞的手抄文学《一只绣花鞋》终于问世了……在‘文革’中流传最广的故事和手抄本就是《一只绣花鞋》——‘文革’后，电影《雾都茫茫》便是取材于《一只绣花鞋》的故事。”北京各媒体都大篇幅宣传了这本《一只绣花鞋》。

问题就出在“一双”与“一只”的名称相似及汪国真序中那句“电影《雾都茫茫》便是取材于《一只绣花鞋》的故事”，其实二者除了故作神秘的开头（《一双》是老更夫发现春森路一黑楼上的人影和一双绣花鞋，《一只》是老清洁工发现教堂小楼上的人影和一只绣花鞋）及几处情节相似外，主要内容并不相同。《一双绣花鞋》讲的是中共特工打入国民党高官府上窃取国民党准备对陪都重庆实施大破坏的绝密计划，在此过程中与国民党高官之女及府上丫环（中共卧底）发生三角恋爱纠葛，几经周折终于完成任务。而《一只绣花鞋》讲的是国民党政府在崩溃前曾秘密成立梅花党，旨在打入中共内部搞破坏。中共特工设法与梅花党党魁的女儿邂逅，潜入梅花党党部盗取（此二处情节显系模仿《一双绣花鞋》）有梅花党人名单的梅花图却告失败。多年后梅花党开始活动……文革中流传的“梅花党”故事（当时并不叫《一只绣花鞋》）甚至把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也扯了进去，诬之为“梅花党”党魁。

《一只绣花鞋》的出版和炒作在重庆引起轩然大波，因为重庆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几乎无人不知《一双绣花鞋》，况浩文认为：“《一只绣花鞋》书中的道具，有关重庆的反特情节，与《一双绣花鞋》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汪国真在序中称电影《雾都茫茫》取材于《一只绣花鞋》，而《雾都茫茫》是我根据我的小说创作的剧本。我的作品在1958年就创作完成了，而张宝瑞出生于1952年，难道他6岁就有能力创作长篇小说？”“在‘文革’中，我因为《一双绣花鞋》而受尽折磨，当我被关进牛棚里时，为什么没有人说这是他的作品？”

重庆文学界对《一双》与《一只》的评论持续了两年。重庆有媒体甚至提出

了“捍卫《一双绣花鞋》”的口号。《红岩》杂志有文章认为，《一双绣花鞋》在重庆百姓中可谓家喻户晓，而张宝瑞的书名是在对读者进行误导。张宝瑞当年可能不知道传说的《一双绣花鞋》是谁写的，但他肯定知道这个作品不是他自己写的。他巧妙地把自己打扮成原创者，伪装成手抄本中一枝独秀者，这是一种文学上的巧取豪夺。还有论者干脆称张宝瑞为“文坛剽客”。在两书引起争议的两年中，拿着自己珍藏的手抄本找到况浩文的热心老人有 60 多位，他们都表示，如果况老先生要告上法庭，他们就愿意提供真正的手抄本证据。

令人不解的是，《难》中却作了这样的介绍：“《一只绣花鞋》讲述的是：1948 年国民党政府在崩溃前，曾秘密成立梅花党，旨在打入中共内部伺机而起。中共特工龙飞设法与梅花党党魁的女儿白薇邂逅，潜入梅花党党部盗取有梅花党人名单的梅花图，却告失败。从此，梅花图杳无踪迹，图上梅花党人名单成为悬秘。十年后，核潜艇设计图外泄、老虎滩出现伪装女士、火葬场闹鬼，销声匿迹十几年的梅花党又开始行动。”接下来的介绍却是：“作者况浩文，1951 年全国镇压反革命运动时在西南公安部五处任干事，参加重庆 3·13 逮捕行动逮捕一个女人看到一双绣花鞋，给他留下强烈印象。1957 年他据此创作了小说《在茫茫的夜色后面》，1964 年初改写成电影剧本……‘文革’开始，电影停拍，但故事情节却被人们传开去，添油加醋，甚至扯上了 1965 年归国的原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称其为梅花党成员，高跟鞋里藏有发报机。”（498 页）

显然，《难》的作者把《一只绣花鞋》与《一双绣花鞋》嫁接在一起，将二者“合二为一”了，书名和内容是《一只绣花鞋》，作者和创作经过则是《一双绣花鞋》。这样做的依据不知何在？是想调和矛盾吗？不管怎样，作为一部严肃的国史著作，出现这样的失误都是很不应该的。

《难》没有再称张宝瑞为《一只绣花鞋》的作者，却又在接下来的段落里介绍：“张宝瑞是‘文革’时期手抄本小说创作的主流人物，一人写了二十多部，其中《醉鬼张三》最受欢迎，流传最广……”（498 页）这个论断也不知是否有历史依据？当年有名的手抄本小说《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张扬曾为这一本书坐牢，《一双绣花鞋》的作者况浩文曾为这一篇作品关牛棚受批判。而“写了二十多部”手抄本小说的张宝瑞竟会直到《一只绣花鞋》出版时才突然“浮出水面”，这不是太离奇了吗？《难》的作者在写作这部分时是参考了杨健所著《“文化大革命”

中的地下文学》一书的，但不知为什么没有认真看看杨健书中“《梅花党》、《一双绣花鞋》及其它”这一节，杨健在这一节中写道：“在文革中，流布最广的故事还属《梅花党》和《一双绣花鞋》。”“《梅花党》的基本故事，是指认王光美（这当然是一种诬陷）、郭德洁（李宗仁夫人，当然也是莫须有）等五位著名女领导人，为美国‘战略特务’。所以此故事根本荒诞不经，不值一驳。”据杨健调查，《梅花党》这类故事有不同版本，“说一拨，就是一种讲法，不定就添点什么，去点什么。”没有谁听到过完整的故事，“讲故事的人往往信口胡编，节外生枝。有时，甚至将别的故事，如《绣花鞋》也塞入其中。”还有另一个如今被张宝瑞写进其《一只绣花鞋》中的《绿色尸体》，据杨健调查：“这个怪诞不经的小故事，就曾在北京市居民中，在河北石家庄 27 军，在安徽当涂 86 医院，在南京汤山第 11 测绘大队，在广州中山大学等地流传。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文化现象’。”（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 1993 年 1 月第一版第 345—346 页）

杨健此书出版时（1993 年），无人听说过《梅花党》、《绿色尸体》这些故事的作者是张宝瑞。张宝瑞本人也没有站出来宣称自己就是“创作”了这些手抄本小说而且比“梅花党人”还潜伏得更隐秘（因而文革中从未受过迫害、拨乱反正时也从未有人提及）的“主流人物”。《难》的作者现在是依据什么确认张宝瑞“一人写了二十多部”手抄本小说的“主流人物”？是像杨健那样作过大量调查，还是查阅到了相关历史档案资料的记载，还是仅仅照搬了如今书商的炒作宣传？

### 关于郭路生的诗《相信未来》

在第七章第二节第三小节“‘文革’后期的地下文学”中，介绍现代主义文学时，专门介绍了郭路生和他的诗《相信未来》，并且引用别人的评价称之为“‘文革’中新诗歌的第一人，为现代主义诗歌开拓了道路”，甚至高度评价他“相当于惠特曼在美国诗歌中的地位”（492 页）。《难》的作者引用这样的过誉而没有作一点分析，看来是基本上赞同的。然而，对于一部严肃的国史著作，这样随意对一位诗歌史上影响并不大的诗人作出如此高的评价，是不是太慷慨大方了呢？

且不说郭路生（食指）的这首《相信未来》在艺术风格上是否称得上“现代

主义诗歌”，笔者在这里只想谈谈对该诗的不同理解——早在 2000 年就已经有论者发表了意见：刘双发表在《黄河》2000 年第一期（总第 83 期）上的《质疑对〈相信未来〉诗的诠释》一文中，对这首诗隐晦的内涵及其诞生的背景，作了详细深入的考察与剖析，他认为：“《相信未来》是一个利益集团——红卫兵（注：作者本文中的‘红卫兵’指的是由干部子弟组成的‘联动’一派‘老红卫兵’），在‘文革’年代的代言作。”“诗人食指本人就是联动成员，虽然他没有参与联动的打、砸、抢活动，也没有被捉和被放（他曾经去公安局自首），但是，就情感世界的归属，诗人应该是属于那个青年贵族阶层的。”“诗人对红卫兵运动非但没有丝毫的批判和反思，反而为它的短命夭折而惋惜。他和众多的红卫兵分子一样，沉溺于往日的疯狂，为了失去那终极的肆虐而痛心。”“1968 年，‘文化大革命’的重心已经远离中学校园。复活红卫兵运动的希望已彻底破灭。不要说 66 年的老红卫兵，就是在 67 年曾经火爆过的北京中学‘四·三’派和‘四·四’派也被冷落了。共和国同龄人‘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豪情已被视如粪土。诗人在 68 年 2 月写下的《给朋友》是这样结尾的：‘朋友，请不要用目光问我/ 这样结束是不是有些突然/ 只待暴风雨式的生活过去/ 再给我们留下热情真挚的语言’，这其中欲罢不能的情感是不言自明的。几乎同时期，诗人写下了他的《相信未来》。《相信未来》是诗人献给无可救药的、已经死亡了的、被‘无产阶级司令部’干尸化了的红卫兵运动的挽诗。诗中有叹息，有泪水，有等待，有确信，惟独没有反省和自责。这不是诗人的过错，当时诗人的思想就是那么一个水准。莫名其妙的是：30 年过去，这种无悔的情感在以讹传讹的诠释中被描述成一个高尚的、可以被炫耀的情结，真是既荒唐又滑稽。”“红卫兵的理念是混乱的，但是他们并没有丧失直觉。1967 年初，红卫兵运动大势已去。曾经无限风光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在一篇与遇罗克的《出身论》进行辩论的长文（注：即《评“出身论”》，见徐晓、丁东、徐友渔主编《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9 年 1 月第一版）中极尽全力仍感语言苍白，理屈词穷，无法驳倒遇罗克对反动血统论的批判，于是凭着一种直觉写下了如下意味深长的文字：‘我们不指望从笔墨中赢得自己的胜利，我们要让历史来作证。结束这篇文章时，我们的心情非常激动，我们想到的不是今天，而是几十年以后的明天。’——这就是非诗歌版本的‘相信未来’内涵的正

面直述。遇罗克对这段文字极为敏感，他在反驳文章中写到，如果 20 年后联动分子当了政，‘这将是多么可怕的局面……，中国的局面要葬送在你们的手里’。”

诚然，刘双的分析和评价只是一家之言。但是，将《相信未来》作者炒作吹嘘为“‘文革’新诗第一人”和“惠特曼”，不也只能算是一家之言吗？作为一部“尽可能价值中立地审视过去，达到反思的高度”的国史，不是应该在介绍和评价一首小诗的时候更多一些冷静的反思吗？何况，这首诗无论是艺术价值还是历史意义，都远不如郭小川的《团泊洼的秋天》，而郭小川这首诗却只在一句话中一笔带过，只称之为“干校文学代表”（499 页），这与加在郭路生头上的“‘文革’新诗第一人”和“惠特曼”之类冠冕相比，不是又显得太吝啬了吗？

### 关于“李一哲”大字报

《难》在第一章第二节“怀疑文化大革命的社会思潮崛起”中，提到广州的“李一哲”大字报。书中说：“大字报贴出以后，在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争论。中共广东省委把这篇大字报定成‘反动大字报’，宣布‘李一哲’为反革命集团。”（60 页）

《难》的作者看来对“李一哲”大字报事件的情况了解不够，或者是虽有所了解却表述得不够准确。历史事实并非这样简单。在“李一哲”大字报贴出后，中共广东省委并未简单地把“李一哲”打成反革命集团完事，而是采取了一个至今仍然令人不解的做法：组织广东省委宣传部写作班子“宣集文”写出批判“李一哲”大字报的文章，同时又允许“李一哲”写出反驳的大字报并公开张贴出去，然后又将“宣集文”的批判文章与“李一哲”的四篇反批判文章一起印成学习材料，发到各基层单位甚至街道居委会组织讨论（笔者当年就曾得到从广州传到重庆的这份学习材料并将李一哲的“四评”全文抄录在朋友中传阅）。

李一哲的这“四评”分别是：《吓人战术——评某些权威的批判》（1974 年 12 月 11 日），《请君入瓮——二评某些权威的批判》（1974 年 12 月 16 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吗？——三评某些权威的批判》（1974 年 12 月 27 日）、《杜岗的把戏——四评某些权威的批判》（1974 年 12 月 31 日）。最有趣的是，“李一哲”在“二评”中把“宣集文”置于了“恶毒咒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位置上进行批判和嘲弄，其中写道：“‘宣集文’说‘李一哲说封建独裁专制的恶习惯深中

于群众乃至一般共产党员的头脑之中’，因此，‘宣集文’说这是‘强加’，是‘诬蔑’广大群众、党员。”“其实，这句话也不是李一哲创造的，而是毛主席说的（见毛选《井冈山的斗争》）。也是我们逐字逐句抄下来的。那么，按照你们的说法，岂不是毛主席在‘强加’，在‘诬蔑’广大群众和广大党员了么？你们该当何罪？你们该不该打板子？”写到此处，“李一哲”得意地写了一句：“出一身冷汗吧，‘宣集文’！”

这四份大字报原文张贴在广州中山路到北京路口的墙上。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即“宣集文”大量印发全省各基层单位供群众批判参考。奇怪的是，在印发的这份材料中，前边是“宣集文”批判李一哲《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官样文章，后边是“李一哲”嬉笑怒骂反驳“宣集文”的这“四评”。因此一般人读后的感觉就是：“宣集文”被“李一哲”批倒了，而且可以说是被批得体无完肤。这是不是“假批判、真扩散”？批判“李一哲”的主持者为什么要作这样的安排？令人困惑不解。这到底是在文革前期一度被打倒、当时又重新主政广东的赵紫阳的特意安排，还是另有“最高”的首肯？有兴趣者不妨对此作一些调查研究。

---

#### 【早期红卫兵专题·史林一叶】

作为红卫兵的发起人之一和研究者，作者为写作此文采访了清华附中当事人上百人次。此文在《炎黄春秋》2008年第12期发表时略有删节。为有助于研究者参考，本刊特发表作者提供的原稿（只做了个别无关史实的文字编辑）。

## 清华附中红卫兵 100 天

阎阳生

作为红卫兵运动的始作俑者，清华附中红卫兵已成为一个专用历史名词。但它从1966年5月29日圆明园定名公开反对校领导，在6月24日贴出“造反精神万岁”对抗工作组，在8月1日毛泽东回信和8月18日天安门接见达到高峰，继而在8月27日“暴力恐怖”中发布《十点估计》后脱离主流并迅速衰败，

其独立的生命期不过百日。

但也就是这 100 天，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震惊海外。所以让我们把目光穿过广袤的历史时空，浓缩到 1966 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 100 天。

## 背景和伏笔

1966 年，随着国家经济的全面好转，党内郁积的政治矛盾终于浮出水面。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在我们身边。而在教育领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而在北京西郊的清华附中却在独自进行一场方向相反的教育改革。1966 年雄心勃勃的校长万邦儒正把清华附中推向颠峰。其最重要的标志是在北京空前绝后的两届预科的创立，和在北京市中学生运动会的四个组别中夺得三项冠军。

和北京市的其它中学统归北京市教育局管理不同，清华附中是清华大学直接领导的。预科的教材独立于其它中学，由大学编写，主课全由清华大学讲师任教。上了预科等于一只脚踏入了清华大学。当时，清华附中已成为北京市收分最高的中学，学生的分班和学号都是按考分排列。预科的选拔使原本已成为学生信条的个人竞争更激烈了。

清华附中地处清华等八大学院和高等军事院校环绕之中，高级知识分子出身和具有知识背景的中层干部子弟是其核心。个人奋斗和藐视权威是中产阶级知识背景的两派的共性。

高二的干部子弟杨盘、阎阳生、邝桃生、张承志组织了“红缨”小组，准备跳级参加高考，并为此出了一种既有难题解析又有时事辩论的手写小报。几乎与此同时，以高二的周舵为代表的教授子弟也办了一份手抄小报，其内容更偏重时政也更隐晦，在高知子弟中传阅。

清华附中地处清华园和圆明园环拱之中。后来成为著名影评家的方位津认为，圆明园已是两派共同的胎记。那是学校进行阶级教育劳动锻炼的基地，也是学生进行早读和秘密串联的据点。

清华附中校领导大多是资产阶级和民国旧吏出身，城里中学的“四清”使他们内心震撼。从 1964 年开始，迎合日益左倾的政治气候，学校组织了“干部子弟学习小组”和军训队。对干部子弟的拔苗助长引起了平民和高知子弟的反感和

不服。

1964 年，由于一次偶然的同学争斗演变成全校“阶级路线”的大辩论。万邦儒校长把娄琦（平民子弟）和熊刚（干部子弟）的动手，上升到“打干部子弟”的“阶级路线”高度，引起高知子弟的不平。两派的大字报互不相让，竟贴满了半个大饭厅。

最后虽然学校强势出动以双方认错平息了风波，但一道“阶级出身”的鸿沟把学生分为两派。各班团支部的发展会也成了两派斗争的焦点。比如后来红卫兵的主要发起人王铭的入团就几经周折，几乎要上告中央。郑光召回忆：两派据理力争，互不妥协，连外班的同学都挤进我们教室来“观战”。直到最后举手表决，差一票也不行。

### 一、1966 年 5 月中——6 月中（创立期）：

#### 对抗学校领导为代表的教育路线

**[典型事件] 5. 29 圆明园成立红卫兵、6. 3 第一张反校领导大字报、6. 8 外校声援冲击清华附中**

1966 年 5 月中旬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成立中央文革小组。5 月 25 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直指校领导陆平的大字报在学校撕开了文革的序幕。

#### 5 月中：对校领导态度两派对抗

几乎与此同时，清华附中也从空泛的文艺辩论开始对学校教育方式的评判。最明显的是预科 651 班干部子弟骆小海等的墙报，其公开对学校领导的质疑引起了学校的紧张，把他称为“预 651 观点”组织批驳。

当时学校的乒乓球队长仲维光回忆道：“我们和高 631 班郑光召、宋海泉和戴建中等人（高知子弟）也形成了一个小组，经常在一起摸索对方的动向，商量对策……和他们（干部子弟）在暗中对抗。”拥护学校领导的声音占有绝对优势。

据卜大华回忆：这时清华附中党支部已列了一个“闹事学生”的名单上报清华大学党委，并在当地派出所备案。学校党组织还分别到这些学生家，以 57 年“反右”为暗示，让家长管教学生。

1966 年 5 月下旬，在学校的压力和学生的孤立下，高中几个班级反对校领



导的骨干开始秘密串联。仲维光回忆：“他们开始在熄灯后跑到圆明园去秘密碰头，商量如何在学校掀起运动，揭发学校领导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甚至直到半夜才回宿舍，而且居然男男女女不在教室。平民子弟早对干部子弟们飞扬跋扈不满，一听到他们密谋反对校领导，立即汇报上去。此时，校领导已发觉自己养虎为患，只好依靠平民子弟，以期自我保护。”

### **5月29日：红卫兵成立**

那时的圆明园遗迹星星点点地散落在无边的稻田和落叶当中。被现在视为花样年华的男女学生，没有在圆明园这座“后花园”里初恋约会，而是在密谋造反。

关于红卫兵成立的日期，海内外两派的文章几乎都认定是1966年5月29日。“5月29日下午，在圆明园召集各班不同政见者骨干分子开会，正式通过了‘红卫兵’的统一署名。”（骆小海）“5月29日一批干部子弟在与学校一墙之隔的圆明园集会，成立了红卫兵。”（郑光召）

但几个红卫兵主要创始人都对此不以为然。卜大华：“在那一天，并没有明确成立红卫兵，主要是统一行动。”王铭：“是一个非常松散的、有相同政治倾向的一些人的聚合。”

目前最原始的记录是宋柏林1966年6月3日的日记：“……中午我们‘红卫士’的一部分战士到圆明园去开会，正式建立起组织机构，订好了反攻计划。”但此时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已经贴出。

关于红卫兵名称的来源，张承志在他的日文书中有回忆：“我在班里写的小字报上的署名就是‘红卫兵’，并用红铅笔画了一个骑马的战士的图像。”笔者清晰地记着这个“红卫兵”图案，而没有“红卫士”的印象。

笔者的记忆是，5月29日是各班的反对派统一行动的协调会。6月1日晚上在圆明园开会正式采用张承志在墙报上用的署名“红卫兵”作为正式名称，并决定以此名义贴出大字报。各班的代表决定把5月29日定为“红卫兵”的成立日，一是因为那天是第一次统一组织会议，二是自负地认为我们的行动是在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之前。

### **6月2日：红卫兵署名大字报**

6月2日，第一张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出现在五楼大教室。虽然大字报只是亮相式的激昂口号，但已鲜明

地向校领导挑战：

……资产阶级的老爷们，你们既然挑起了这一场斗争，那么好吧！我们来者不拒，坚决奉陪到底，不拔掉黑旗，不打垮黑帮，不砸烂黑店，不取缔黑市，决不收兵！

……

红卫兵

1966 年 6 月 2 日

这张大字报的下部除了红卫兵核心的签名外还留有一大块空白，是给同意大字报观点的人签名用的。当天在这张大字报上签名的有 100 多人。但拥护校领导声讨红卫兵的大字报立即贴满四周，也形成了大批的签名。

后来的工作组长刘晋回忆：“学校当局召开紧急会议，组织学生写大字报进行反击。因此，几十个同学组成的‘红卫兵’组织处于孤立状态。”但当时学校的书记韩家鳌回忆说：“对红卫兵这事，我们就是觉得那个太突然了。我们都来不及想，是怎么回事？我们就知道是干部子弟（在闹），就想他们是不是有什么意图？”

在红卫兵大字报上签名的有不少出身自由职业的学生，而拥护校领导的很多是担任党团干部的干部子弟。当时初二的史铁生曾画了一幅一耳大一耳小的漫画，讽刺红卫兵偏听偏信，受到校长的私下鼓励。

但有两个人的参与给处境孤立的红卫兵极大的支持。被学校树为标兵的学生党员干部马云香毅然在红卫兵的大字报上签了名，使学校党支部十分难堪。而 57 年大右派章乃器的儿子章立凡独立贴出大字报批判校领导，无意中与红卫兵形成呼应。

### **6 月 8 日：外校驰援清华附中**

1966 年 6 月 6 日开始，城里的四中、十三中等学校和海淀区八大学院附中的学生络绎不绝地来到清华附中，声援红卫兵。“6 月 8 日，在学校西侧通往体

育学院的路上突然出现了黑压压的一片、近百位骑自行车来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的干部子弟。校领导哪里见过这种阵势，怕出事关了西校门。校门外堆积了几百人，大有一触即发之势。”（郑光召）

韩家鳌回忆：“有一帮学生要冲过来，什么人大附中的，还有四中的……薄（一波）家兄弟。我那时作书记，就站在校门口一个课桌上，说我们搞什么活动都是要按照学校的安排。一方说‘往里冲！’，一方说‘不行！’也就开始推推搡搡的。”

当时在教育系统内部通报了清华附中闹事的红卫兵，成为各中学领导压制不同意见的武器，但反而使各校的反对派知道了红卫兵。

宋柏林 6 月 5 日的日记中留下了另一个线索：“王铭找了孔原，熊钢找了薄一波，还找了许多其他的老干部，都坚决支持我们干革命。”而在当天宋柏林的父亲宋维轼也到清华附中看了大字报，他时任大军区级的解放军政治学院政委。

事后进驻的工作组给团中央的汇报是仅存的文字材料：“6 月 8 日，外校 300 多人来声援左派，被拒之门外 10 小时，并调来大学部的打手——校卫队，请来海淀分局的便衣队，企图镇压群众运动。6 月 4 日，团中央派 2 人来了解情况，被盯梢、偷听。”

激烈对峙的双方在大门内外贴满了标语和大字报。四中送给清华附中红卫兵一幅对联是：“先驱者，为革命，洒尽碧血；后继人，保江山，掏出红心。”

针锋相对的代表是清华附中高三工人出身的女生宣夏芳，她高声朗读了以“宣战”名义贴出的大字报《致×中的干部子弟们》：“什么是红卫兵，是反动组织黑卫兵”，“你们后面是靠不住的冰山”，“我们要用鲜血保卫党支部，保卫党！”但这时清华附中两派都不知道，在 6 月 3 日刘少奇邓小平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团中央书记胡克实领受了领导北京中小学文化革命的任务，决定向重点学校派遣工作组。

## 二、1966 年 6 月中——7 月底（发展期）：

### 对抗工作组为代表的传统体制

**[典型事件] 6.8 工作组进校、批斗校领导大会、革命委员会成立、红卫兵和工作组分裂、6.24 “造反精神万岁”、7.26 江青接见、7.29 人民**

## 大会堂毛刘分歧、8.1 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的信

### 6 月 8 日：工作组进校，宣布支持红卫兵

6 月 8 日晚上，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进驻清华附中。工作组一共 5 人，多是在中央团校学习的各省市骨干。工作组组长是章建华，但实际掌权的是中央团校哲学室主任刘晋。

身兼海淀区工作队副队长的刘晋戴着眼镜，表情严峻，第二天晚上即召开全校大会明确支持红卫兵，称他们是坚定的左派，并宣布学校领导班子靠边站交待问题。形势的突变使大操场一片愕然，红卫兵随即以胜利的姿态贴出题为《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团结起来》的大字报。

学校的大字报出现了 180 度的转弯。工作组在随后的汇报中对此颇为得意：“到目前为止，全校师生已贴出 20000（？）多张大字报，揭露了一批严重问题，揪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初步开展了批判斗争，大煞了牛鬼蛇神的威风。工作组进校时，右派势力气焰嚣张，左派力量孤单，左派学生仅 101 人，占学生总数的 8%；左派教师 2 人，占教职工总数的 1.7%。目前，左派学生已增加两倍，占全校学生总数的 13.9%。”

刘晋在 40 年后告诉笔者：6 月 8 日，当时主持团中央工作的胡克实打来紧急电话，让他带工作组去清华附中支持红卫兵，并要求他每天晚上九点用直线电话汇报情况。

### 6 月中旬：批斗校领导和成立革委会

从 6 月 17 到 20 日，全校开始在工作组的主持下三次批斗万邦儒和其他校领导。刘晋回忆道，他当时宣布“对学校领导万邦儒只准动口不准动手。”

在这三次批斗中，万校长只低头，但是不认罪。万邦儒在文革前后都被两派公认为独特的教育家，络腮胡子口若悬河充满魅力。看着自己苦心培养出来的优秀学生反过来争相批判自己，他的痛苦可想而知。

有两件事情在这第一轮批斗中给了万邦儒及支持者致命的打击：一是 6 月 17 日中央决定暂停高考，这让以投考一流大学为唯一目标的高知子弟顿时感到“五雷轰顶，一片黑暗。”（周舵）“甚至烧毁了自己所有的课本。”一是 6 月 20 日宣布万邦儒撤职反省，让万邦儒认为运动只是一阵子的幻想破灭了。主管附中事务的清华副教务长邢家鲤也被揪到附中批斗。

6月21日，全校召开师生代表大会选举革命委员会。但当工作组在人选上要求有更大代表性时，遭到红卫兵抵制。结果21个革委会委员基本由红卫兵核心组成，王铭当选主任，张晓宾、卜大为副主任。虽然在那种情势下是一面倒的高票当选，但昔日占据舞台中心的高知子弟看着这些其貌不扬的干部子弟走上主席台，内心感到“个个面目可憎”（方位津）。

这时工作组才感觉到红卫兵并非是一群可以随意摆布的中学生，已表现出强烈的权力意识。工作组不可能容忍在正统的党组织之外出现第二个权力中心，开始分别谈话分化红卫兵，并一手筹建新的分团委以取代革委会。红卫兵头头的碰头会又回到圆明园。

当时红卫兵并不知道工作组的做法直接来自中央。6月下旬，胡克实传达了刘少奇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认为工作组已控制了局面，提出“复课闹革命”和“消化红卫兵”。

### **6月24日：《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

6月23日，团中央的《中国青年报》发表社论《左派学生的光荣责任》，强调左派要服从工作组团结大多数。红卫兵随即在6月24日贴出两张大字报公开进行反击，一篇是《左派学生的光荣责任是彻底闹革命》，一篇就是后来震动中央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这篇贴在教学楼一楼门厅正中的大字报，第一句话就提出了一个骇人听闻的观点：革命就是造反！“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

这篇充满激越口号的文章由红卫兵才子骆小海执笔，后来被一再模仿变成文革时代的新八股。但最后的结尾“……对今天这个修正主义的清华附中，就要这样大反特反，反到底！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明眼人一看就是针对掌权的工作组的。但工作组当时并没有引起重视，只是觉得在共产党的天下提倡“造反”匪夷所思。

当时狡黠的红卫兵故意留了一个破绽，没有点明这段话的出处。工作组果然上当，写了简报上报，一直报到刘少奇、党中央那里，被定性为“反动”。实际上这句话缘自6月9日《人民日报》第六版的一篇不起眼的短评《汉弗莱的哀叹》。它引用了毛泽东在延安时代给斯大林祝寿时的一段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

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没有人注意到这句隐含在边角评论中的只言片语，但嗅觉灵敏的红卫兵马上捕捉到了。

当高二的红卫兵刘刚、张树平等把这张“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抄到清华大学时，给了当时被清华工作组压制的蒯大富以极大的支持。但遭到拥护工作组的主流学生愤怒围攻，甚至到清华附中要求“逮捕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小集团红卫兵”。

6月26日，胡克实听了刘晋的汇报后，认为红卫兵“相当不懂事”，“能不能把党团组织恢复起来，把红卫兵消化在党团组织之中。”（卜伟华摘自清华附中工作组1966年6月27日简报）同时许多其他中学的红卫兵被宣布为“非法”，清华附中再次成为内外瞩目的焦点。

但当红卫兵在7月4日《再论造反精神万岁》正式引用毛泽东的这段语录时，工作组已被拖入非常被动的境地。老练的工作组一方面突然成立排除了大部分激进红卫兵的分团委，由自己担任正副书记取代了革委会；一方面迂回拜访红卫兵头头的家长，采取怀柔分化政策。并于7月17日把208名红卫兵骨干拉到沙城兵营封闭军训，逐渐夺回了主动权。

### **7月20日：《阶级路线万岁》和批斗升级**

尽管工作组和红卫兵出现矛盾，但在批判学校领导上是一致的。除了全校的批判大会外，各班都开始批斗老师，并且扩大到“右派学生”。在宋柏林的日记里记录了7月5日批斗团委书记顾涵芬、7月11日批判班主任丁淑慧、7月20日批判学生郑国行。

批斗会由各班的红卫兵核心小组发动，这些未经世事的学生对组织批斗会却并不陌生，学校领导给他们入学的第一课就是去参观清华大学的“反右展览”，现在反过来自食其果。班主任被争先恐后的学生围在中间，任何辩解都会招来更激烈的呵斥甚至墨水和浆糊。

7月1日北京大学附中“红旗”纪念建党日，“邀请上提出苛刻要求，一律是干部子弟，而且尽量穿黄军装。”（宋柏林日记）这个等级森严的晚会首次唱出了《造反歌》。7月20日，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激进派“齐向东”写出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的大字报并在全校广播。也就是在这天他们开始批斗本班四个出身不好的“右派学生”。

## 7月下旬：与工作组摊牌

这时红卫兵内部出现了一个意外的冲击：红卫兵第一把手王铭的父亲受到批判，而他跑到现场阻止了揪斗他爷爷批判会。王铭的父亲王仲方曾任已被打倒的罗瑞卿的公安部办公厅主任。胡克实要求刘晋借此机会迅速解决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问题。

7月24日晚上，双方班子的全体成员在教学楼办公室正式摊牌。此前工作组已经无法容忍红卫兵的我行我素，工作组的小叶曾冲进广播室，撕掉了红卫兵擅自播音的广播稿。据刘晋回忆：在这次马拉松式的交锋中，胡克实三次打来电话，要求他直接点出王铭的问题，打击红卫兵的软肋。

进进出出的刘晋几次提起话头，又都咽了下去。一是发现王铭还有群众基础，二是他发觉红卫兵班子意外地团结，一点名，局势必然无法收拾。尽管刘晋在上司胡克实的质问和下属章建华的催促下几次拍案而起，但根据自己二十几年群众运动的经验，终于没有点名。

而红卫兵为这次摊牌作了充分沟通，策略地让王铭退出一线，以免让工作组抓住把柄。会上由卜大华据理力争，由张晓宾回旋守住底线。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在刘晋被叫出去接胡克实电话的时候，人大附中的徐浩渊跑来告诉了卜大华一个小道消息，“团中央已经把胡启立揪出来了。”两个都自以为摸了对方底牌的对决胜负难分。会后刘晋把风传胡启立倒台的消息报告胡克实时，胡还认定是红卫兵的谣言，命令刘到清华附中召开大会辟谣。

7月27日几乎同时发生了三件事。正在北展剧场的中学生代表大会上做报告的海淀区中学工作团团长周捷，被匆匆赶到的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当场宣布罢官。清华附中红卫兵当即贴出《三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而彻夜未眠的刘晋在最后一刻取消了要和红卫兵翻脸的辟谣大会。

## 7月28、29日：江青、胡耀邦、刘邓、毛泽东和红卫兵

7月28日晚，中央文革小组在北京展览馆电影厅召开大会，宣布撤销海淀区各中学工作组。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骆小海、邝桃生在大会上宣读了《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两篇大字报，并将两篇大字报稿和一个条子递给了主席台上的江青。这封给毛主席的短信大意是：有人说这两张大字报是反动的，请您老人家看看，这到底是不是反动的大字报。江青当场答应一

定给带到，并在上汽车前回身向红卫兵喊道：我支持你们！

几乎与此同时，胡克实带着刘晋、周捷等到正从西北回京看病的胡耀邦家。和忿忿不平的客人相比，胡耀邦没有多说话，只是让他们沉住气观察观察，并“让克实立即向小平同志汇报。”（刘晋）那时很多学校已开始打骂和驱赶工作组。

胡耀邦的次子胡德华当时就是清华附中高一年的学生。他后来告诉笔者，那段时间他父亲很无奈，也看了那两篇造反文章，还问胡德华看过毛主席的《反对党八股》没有，“你们那个造反精神万岁啊，你看像不像？”

这里有个更大的背景当时无人知晓：7月？日在南方的毛泽东在武汉高调横渡长江后，已于7月18日悄然回到北京。在7月29日人民大会堂的接见左派学生的大会上，在刘少奇邓小平承认派遣工作组不妥，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后，毛泽东突然从侧幕后走上主席台。张晓宾等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代表几乎不相信眼前领袖云集太阳升的场景。

### 三、1966年8月初——9月中（掌权期）：

#### 对抗党政机构为代表的社会秩序

**【典型事件】 8.1 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的信、8.18 毛主席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对联辩论和破四旧、红卫兵掌权、Y卧轨事件、校园暴力和刘树华自杀、8.27《十点估计》、大串联**

#### **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的信和红卫兵掌权**

在这时正在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放了毛泽东8月1日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对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造反精神大字报和北大附中彭小蒙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这成为毛泽东对文革和刘邓派遣工作组的第一次公开表态。

但原信当时及以后都未交至清华附中红卫兵手中。王铭、卜大华8月3日从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那里看到手抄件，红卫兵无疑得到了尚方宝剑。

清华附中红卫兵开始独立掌权，年龄最大的也不过18岁。他们按照自己的理想改造学校：拉回了军训的红卫兵，按“巴黎公社的原则”不记名投票重选了革委会，组织全校武装横渡昆明湖，到圆明园参加劳动，把学校改名为“红卫兵战校”，并准备迁校黑龙江。



但失去了学业支撑的“乌托邦”很快烟消云散。失去工作组目标的红卫兵又对准老师和同学，清一色干部子弟的革委会使平民出身的红卫兵元老寒心，带着烫伤的方位津涸到湖心几乎绝望，劳动晒红皮肤却抹不去出身的阴影，迁校的恐慌使大批档案遗失殆尽。

但很快这些烦恼就被社会上“破四旧”的浪潮所淹没，“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吼声冲进围墙。领潮流之先的清华附中红卫兵眼看被抛出激进主流之外。

### **8 月中：“对联”辩论到“破四旧”**

在 8 月 6 日天桥剧场的“对联”大辩论中，主张理性的清华附中面对城里整齐划一的“红卫兵纠察队”已处于微弱的少数，只能联合几个附中发出不要打人的“紧急呼吁书”。不料《呼吁书》报入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被毛泽东批评，认为这是压制群众运动。据说北京四中红卫兵负责人曾列席中央高层会议。他们 8 月 13 日在工人体育场的大会上明确反对清华附中，并散发了批判《呼吁书》的文章《你们的屁股坐到那里去了》。

西城区中学为首的多数派坚持要斗争据说伤害了红卫兵的小流氓。清华附中则主张以控诉工作组和团中央为主题。最后不得不投票表决，清华附中明显处于劣势。结果最后由负责学校文革的王任重出来打圆场。大会由李富春代表党中央宣布胡耀邦为首的团中央书记“三胡一王”停职反省，所谓小流氓也被警察押到十万人体育场的跑道上，接受皮带和拳脚。

当目瞪口呆的胡德华拼命骑车从工人体育场赶回家时，胡耀邦已被团中央的红卫兵押走。他一夜之间变成了“黑帮子弟”。

### **8 月 8 日：Y 卧轨事件**

但在清华附中，各班对学生的批斗不断升级。高一才貌出众的女生 Y 由于不堪红卫兵的轮番批斗，在 8 月 8 日晚上跳窗逃到圆明园，然后到五道口冲向驶来的火车。当“四个邮电学院的大学生穿过铁路时，发现铁轨边的一个蜷曲的人，浑身是血在草丛中翻滚呻吟……”命运之神并没有收下这个 17 岁的花季少女，火车司机看到一袭白裙迎面扑来，紧急制动……

关于她卧轨的原因众说纷纭。Y 四十年来拒绝一切采访，只记得那天是 8 月 8 日晚上，“大学里到处挂满大字报乱哄哄的，后来才知道那天在庆祝发表十六

条。”“我只想躲起来，找个清静的地方，找一个没有人迫害的地方……”

清华附中红卫兵 8 月 16 日参加围攻团中央。晚上“把胡克实押回学校，‘借’来斗争。”宋柏林在 8 月 17 日日记中承认“这次大会开得很没底。”

### **8 月 18 日：毛泽东天安门接见红卫兵**

卜大华回忆“八一八”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清华附中七、八百人，半夜 2 点钟从学校发车，去天安门参加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大会’游行。当时（卫戍区）姓白的副司令把我一个，彭小蒙一个，叫进天安门说：毛主席要把红卫兵请上天安门照相。”

分配清华附中 40 人，名额最多。但只上去了 27 个人，留下了 23 人。因为规定任何家庭有问题的人都不能上去。没上去的人有叶侨生，他父亲刚给揪出来了。王铭不在学校，被他爷爷的事给缠住了。张承志、邝桃生到外地串联去了。但平民出身的陶正也被留下了。

一上到天安门就乱了，所有的中央领导都在。只有周恩来跑来跑去，一面要鼓舞情绪领大家唱歌，一面要维持秩序安排人分批和毛主席照相。阎阳生和杨小燕跑到正中央，“两边是林彪和刘少奇”。阎阳生当天的日记还记录了这样一幕：当他们告诉刘少奇“我们是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时，“刘主席听不懂，连问了好几次。”后来才知道，正是前一天，刘少奇在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的中央全会上被迫退出党中央核心。

而这时更大胆的骆小海、宋柏林和韩钧，忽然发现毛主席正在休息厅里面坐着，“我们不顾一切地冲了过去，紧紧地握住主席的手：‘我们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主席风趣地说：‘万寿也有疆嘛。’我们问：‘您给我们写信了？’主席说：‘还是草稿，还没给你们呢。’我们说：‘我们要永远造反，造反到底。’主席说：‘我坚决支持你们。’”

以上摘自宋柏林当天的日记。第二天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的照片登在所有大报的头条，但和其他学校红卫兵的整齐军装相比，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旧衣破衫显得分外扎眼。

### **8 月下旬：校园暴力和刘树华自杀**

八月的北京已开始笼罩着一种躁动的狂热。“破四旧”已蔓延成群众的私刑，革命激情已殃及外国使馆区。“火烧英国代办处”和围攻印尼使馆也有清华附中

红卫兵的身影。

8月26日开始，发生了被称为“清华附中模式”的校园暴力。宋柏林在当天的日记里也有记述：“……回去后几乎各班狗崽子都被打翻在地，用皮带，竹条猛抽。”

我采访了被工作组圈定的四个“黑帮”中除过世的校长万邦儒外的其他三位：

顾涵芬（女，团委书记，时年30岁）：是预651班红卫兵“把我的头剃了，弄的乱七八糟。然后就跪着那儿批斗我，有几个女同学拿着皮带抽我，拿皮带头打我，把我左眼打坏了。”

冯玉中（政治主任、支部委员，时年38岁）：“8月25日就是在五楼大教室，开始是文斗，后来就有动作了。我反正是打得够戗，就用皮带什么的打，皮带头。”

韩家鳌（党支部书记、副校长，时年34岁）：被逼着烧他送的“腐蚀工农子女的字典。一边把我的头往里面摁。然后后面还有拿着鞭子、皮带的什么抽呀，打的后面皮下出血。”

所有挨打的老师都说，挨打最厉害的是万邦儒和刘树华。万邦儒作为头号“黑帮”校长，打得遍体鳞伤内脏出血。但刘树华只是一个兼任团委副书记的物理老师，由于以前学校有关他感情生活的材料传出，不堪轮番毒打和精神凌辱，爬上烟筒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暴力扩大到学生。最严重的是高631班郑国行、郑光召、戴建中等四个红卫兵的宿敌。“大多数人原来都是一派。许多人为拯救自己，只有拚命打，以此表现‘反戈一击’‘划清界线’。”（郑光召）

### **8月27日：红色恐怖中的《十点估计》**

这次暴力的直接导火索是8月25日城里传来红卫兵被打被杀的消息，红卫兵顿时卷入了疯狂的复仇中。面对全北京如脱缰之马的“红色恐怖”，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创始人于8月27日发表了又一篇逆流而上的声明《十点估计》。

这篇声明一共写了十条，核心就是反对暴力。文章由几个头头连夜匆匆议定，由骆小海执笔汇总，总标题《红卫兵战校红卫兵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是卜大华定的，颇有点代替中央指点全局力挽狂澜的狂妄。

实际上在前一天，张晓宾和骆小海曾跑到钓鱼台向分管清华的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提出，中央能否制止打人。王表示，中央说话不如红卫兵自己说。这是

因为当时北京街头已成为中学红卫兵的天下，根本不把党中央和新市委放在眼里。

第二天，8月27日，《十点估计》印成大批传单，由张晓宾从他父亲的铁道部调来数十辆卡车分四路到北京市内进行大规模宣传。《十点估计》引起了城里主流红卫兵的不满，但在民间引起巨大反响。传单被一再翻印，俨然正式文告一夜贴满全城，继而传遍全国。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乎就在宣传《十点估计》前后，打人风潮也席卷清华附中，刘树华老师跳入烟筒，高二女生郭兰蕙服毒自杀。

对于《十点估计》，激进派说它背叛，受害者说它虚伪。这就是历史。但左右两派都肯定了它在疯狂的“红八月”抵制暴力的作用。

## 9月：大串联和社会夺权

脱离了北京市红卫兵主流的清华附中也难于应付繁杂的校务。红卫兵的革委会决定：让红卫兵到全国去传播火种。最后干脆把办公桌摆到操场，给除“黑帮”和“反动学生”之外的师生盖章发放串联介绍信。

9月，正是以往学校开学的日子，清华附中却成了空巢和外地学生“朝圣”的接待站。陶正回忆：“干部子弟出身的红卫兵头头纷纷外出，我成了看守内阁。我被邀请到各个学校、到七机部讲演，人们让我在语录本上签名。走的时候还喊‘向清华附中致敬！’那时候觉得代表了红卫兵……”

在外省市，清华附中红卫兵几乎同时成了造反派的武器和当权派的稻草。在学校遭到红卫兵批斗的方位津：在湖北“把我当成北京红卫兵的代表，第一书记张体学还接见了我们，让我当了主播。那时全国对红卫兵的发源地清华附中都很神往，我也有一种自豪感。”

清华附中红卫兵那时确实成为各层各派的共同财富。刘刚在帮助蒯大富建立清华大学造反组织命名“井冈山”时，主语还是“红卫兵”。清华附中各派后来轮流掌权，也只是在“红卫兵”后注明派别。“四四派”领袖程金香跟随姚文元到阿尔巴尼亚，也是以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名义，而那几乎是文革时期中国唯一的出访。

但派系的更迭并没有使校领导逃脱厄运，轮流掌权的各派红卫兵“对学校领导的批斗成了各派表现自己革命性的暴力竞赛。”（郑光召）

这时红卫兵的创始人已感到自己历史使命的完结，成为没落的“老（红卫）兵儿”。对理想的幻灭和对武斗的厌倦，使他们浪迹于山水，“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宋柏林日记中长长的书单囊括古今中外，王铭开始同时自学三门外语，并和阎阳生一起成为北京大学德籍教授玛丽的关门弟子。

### 把客观的记述留给后代

我把第四章省略并非对于红卫兵不重要，而是它已经没有了清华附中在历史上的独立性。“联动”的成立是老红卫兵的垂死一争。干部子弟的大院文化也进入了弟弟辈打群架拍婆子的“阳光灿烂”的“血色浪漫”时代。

当毛主席一挥手，整个一代青年都被发配到农村。在“知识青年”的名称下共同面对黄土和油灯时，以往的理想和争斗成了过眼云烟。当邓小平恢复高考使他们十年后重新回到同一起跑线时，“平等”和“竞争”成为这些饱经磨难的“老三届”共同的心声。

在一所著名高校的问卷调查中，竟有一半的大学生认为有必要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客观记述那段历史留给我们的后代，是我们的责任。

2008.5.29 初稿,6.8 缩写,7.17 删节于华清

---

【早期红卫兵专题·闲读偶记】

## 阎阳生《清华附中红卫兵 100 天》若干史实辨正

卜伟华

《炎黄春秋》杂志 2008 年第 12 期刊登了阎阳生的文章《清华附中红卫兵 100 天》。阎阳生是我的校友、学长、老朋友，最近几年和我有过多次交谈，知道他现在热衷于文革史料的收集、整理，并有一些作品陆续发表。我读到的有《红卫兵为什么产生在清华附中》、《蒯大富访谈录》等。

阎阳生几年来采访了不少清华附中的当事人，有原来的学校领导人，也有老师和同学。他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核心人员之一，但他并不满足于仅了解红卫兵这方面的情况，他与当年对立的组织的人员也能很好地交流。他收集、整理的各

种新鲜的史料，不但对我们了解和研究清华附中文革历史，而且也会对整个文革研究和红卫兵运动研究做出贡献。

阎阳生生性活泼，才华横溢，享有 1977 年高考“作文状元”的美誉。他写的东西常有奇思妙想，灵光闪现，但有时又大而化之，不拘细节，难免出现一些史实上的错误。他的这篇《清华附中红卫兵 100 天》（以下简称《100 天》）就是他这种风格的一次集中展现。

事隔 40 多年，记忆都会模糊，还有其他各种因素会影响我们对当年历史的描述。我很同意阎阳生说的一句话：“客观记述那段历史留给我们的后代，是我们的责任”。基于这个认识，我对该文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择其要者作些辨析和订正，有不妥之处，还望阎阳生和其他有识之士指正。

## 一

《100 天》中说，清华附中红卫兵“独立的生命期不过百日”。什么叫“独立的生命期”？文中未作解释。我且将它理解为“独立存在的时间”。按这种说法，清华附中红卫兵独立存在的时间，从 1966 年 5 月 29 日成立到 8 月 27 日发表《十点估计》后“脱离主流并迅速衰败”，按 100 天计算，也就是到 9 月 5 日为止。

我认为，清华附中红卫兵独立存在的时间至少应该从 1966 年 5 月 29 日到 1968 年年底，也就是到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大部分成员毕业分配离开学校为止。在这之前，并未发生这个组织解散或与其他组织合并之类的事情。卜大华曾经说过：“我们是当了三个半月的左派”。意思是说，从 1966 年 5 月底到 9 月中，清华附中红卫兵是左派，以后就逐渐成了右派了。“三个半月的左派”和“100 天”时间上相差不多，但不能说当左派时存在，当右派时就不存在了。

红卫兵中有些人确实较早地脱离了运动。但在那个时候，真正想完全脱离运动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就拿阎阳生本人来说，他是较早地离开了学校，但也未能完全脱离运动。1967 年 1 月，以清华附中红卫兵名义发表的《评〈出身论〉》一文，就出自他的手笔。

1966 年 9 月以后，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主要活动有：

1966 年“十一”前后，接待多批外国代表团和记者。

11 月底，与海淀区十几个学校的红卫兵联合发起成立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

12 月，参与筹备和组织“联动”的几次大会。

1967 年 4 月 22 日释放“联动”后，红卫兵重新组织起来。

11 月，红卫兵开展对“教育革命”问题的讨论，并于 11 月 8 日发表《评最近一时期教育革命中的资产阶级方向》，点名批判《人民日报》10 月 25 日的社论《大中小学都要复课闹革命》。中旬，陈伯达、谢富治专门到清华附中向红卫兵“请教”关于“教育革命”问题。

1968 年 3 月 23 日，与清华附中井冈山部分人员发生小规模武斗。

5、6 月，与井冈山发生武斗。

8 至 10 月，在工宣队的主持下，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进行关于“大联合”的谈判，最终实现“大联合”，成立了革委会。

## 二

《100 天》中说“1966 年，随着国家经济的全面好转，党内郁积的政治矛盾终于浮出水面。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在我们身边。而在教育领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而在北京偏远西郊的清华附中，雄心勃勃的校长万邦儒却正在把一场方向相反的教育改革推向颠峰。其最重要的标志是前所未有的北京的两届预科的创立”。

阎阳生把创立预科说成是清华附中校长万邦儒推行与毛泽东方向相反的教育改革的标志，这是不对的。第一，在创办预科问题上夸大了万邦儒的作用，第二，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断定办预科的方向就是和毛泽东的教育改革方向背道而驰。

试办预科是中央学制问题研究小组（1964 年 2 月成立，组长林枫，副组长蒋南翔）提出的改革学制、提高教学质量的一项重要措施。1964 年，高等教育部批准清华大学和南京工学院试办预科，学制为二年，学生待遇按普通中学学生的标准执行。清华大学决定从清华附中学完高一课程的学生中择优选拔 90 人进入预科，要求在数学、外语、语文和其他学科的基础知识及基本技能方面，适当提高程度，使之和工科大学本科的要求更好地衔接。90 人分为两个班，分别称为预

641 班和预 642 班。1965 年 9 月，清华附中又从学完高一课程的学生中择优选拔，建立了预 651 班和预 652 班。

《100 天》中说：“上了预科等于一只脚踏入了清华大学。”其实也不尽然。1965 年 2 月，教育部就预科学生毕业后的安排问题，函复清华大学、南京工学院：预科学生毕业后，应参加统一考试，成绩合乎录取标准者，试办预科的学校可以优先录取。预科只是试办，没有任何经验，也没有一届预科学生毕业，究竟一个预科班的学生能有多少人考入清华大学，也还是未知数。

### 三

《100 天》中说：在清华附中，“高级知识分子出身和具有知识背景的中层干部子弟是其核心。个人奋斗和藐视权威是中产阶级知识背景的两派的共性。”

可以说在清华附中，高级知识分子和干部子弟是比较多的，但他们是否就可以称作清华附中的核心？而且在这两部分人当中，也并不都具有“个人奋斗和藐视权威”的秉性。把高级知识分子和干部子弟都称作是有“中产阶级知识背景”也是一个很新奇的说法。我认为，在那个年代的中国，还谈不上存在着中产阶级。随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理论的发展，在清华附中，不同出身的同学之间出现了一些隔阂和矛盾，但直到 1966 年春，在全校学生中还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以出身划分的两派。作者举了 1964 年“**娄熊打架事件**”来证明当时学校里已经有了以出身划分的两派。当年此事确实轰动全校，食堂里出了不少大字报。但在对这一事件的看法上，并不完全是以出身决定观点，反倒是有不少干部子弟对熊刚提出了批评。

### 四

《100 天》中说：“1966 年 5 月中旬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成立中央文革小组。”

1966 年 5 月 4 日至 26 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不是毛泽东主持的，是由刘少奇主持的。毛泽东当时在杭州，并未出席会议。

《100 天》中说：“在 6 月 3 日刘少奇邓小平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团中央书记胡克实领受了领导北京中小学文化革命的任务，决定向重点学校派遣工



作组。”

6月3日的会不是政治局扩大会议，而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六九，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40页），这个会议的范围要比前者小多了。

《100天》中说“有两个实质性的事情给了万邦儒及支持者致命的打击：一是6月17日中央决定暂停高考……”

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并决定将1966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的通知，是在6月13日发出的。这个通知发表在6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

《100天》中在谈到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情况时说：“正是（8月18日的）前一天，刘少奇在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的中央全会上被迫退出党中央核心。”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8月12日即已闭幕。

## 五

关于红卫兵成立的日期，作者说，对于红卫兵成立于5月29日这一说法，“几个红卫兵主要创始人都不以为然。”并举出卜大华的话作为证据。

据我了解，卜大华对红卫兵成立日期的观点是非常明确的。他认为，清华附中红卫兵就是在1966年5月29日成立的。

5月29日是星期日，多数学生都回家了，宋柏林那天也回家了，所以他没有参加当天的圆明园会议，在他的日记中只记述了他在家与妈妈谈话的情况。

至于宋柏林6月3日的日记内容，不能判定是指全校的红卫兵组织的事情，卜大华说他不知道那天“正式建立起组织机构，订好了反攻计划”之事。或许宋柏林记录了他们班（高631班）的事情也未可知。

阎阳生所说：“6月1日傍晚在圆明园开会正式采用‘红卫兵’作为统一名称，并决定以此名义贴出大字报。各班的代表决定把5月29日定为‘红卫兵’的成立日，一是因为那天是第一次统一组织会议，二是自负地认为我们的行动是在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之前。”

6月1日傍晚开会决定第二天贴出红卫兵的第一张大字报，合乎情理。但关于各班的代表决定把5月29日定为红卫兵成立日却是一个新的说法。据我所知，清华附中红卫兵中此前还没有人这样说过。

## 六

《100天》中引用了原清华附中工作组组长刘晋在回忆文章《红卫兵运动兴起亲历记》一文中的说法：“学校当局召开紧急会议，组织学生写大字报进行反击。因此，几十个同学组成的‘红卫兵’组织处于孤立状态。”

6月初，红卫兵确实处于孤立状态，大多数学生很自然地站在学校领导一边，对红卫兵进行批评。但以万邦儒为首的学校领导人并没有召开什么紧急会议，去组织学生写大字报对红卫兵进行反击。在红卫兵和反对红卫兵的不同人群中，都没有关于此事的回忆。如果当时学校领导人真的这样做了，那么在6月8日工作组进校，形势反转后，定会成为校领导一条重要的罪状被揭发和批判，但我在学校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揭发和批判的大字报。

## 七

《100天》中说：“当时在教育系统内部对清华附中闹事红卫兵的通报，成为各中学领导压制不同意见的武器，但反而使各校的反派知道了红卫兵。”

据我判断，这里所说的“通报”是根本不存在的。第一，6月1日公布了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后，北京市的教育系统包括各大专院校和中学都乱了套了，教育系统和各学校的领导人对于突如其来的大风暴都是准备不足、自顾不暇。许多学校的领导人在还没有弄清楚中央的方针、政策时，就已经被打倒在地了。第二，极少数的学校在6月初就进了工作组（如北大附中），包括清华附中在内的大多数学校都是在6月8日以后才进驻了工作组。所以不会是工作组写的通报。第三，我曾经对北京市运动初期的各种文献资料和档案材料进行过比较系统的查阅，但从未见过此种通报。

## 八

《100天》中说：“针锋相对的代表是工人出身的清华附中高三女生宣夏芳，

她高声朗读了以‘宣战’名义贴出的大字报《致\*中的干部子弟们》：‘什么是红卫兵，是反动组织黑卫兵’，‘你们后面是靠不住的冰山’，‘我们要用鲜血保卫党支部，保卫党!’”

经查，1966年9月编辑印刷的《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红卫兵战校红卫兵大字报选》中保存有宣夏芳的大字报全文。

宣夏芳大字报的题目是《致十三中、人大附中的“革干子弟们”》。其有关段落原文为：

“另外还有一点，我们和你们有异议，你们口出大言说：‘谁敢动我们红卫兵一根毫毛，我们决不答应。’来头之大，来势之猛，倒也罕见，不过并不稀奇！谁敢？我就敢！我们全校真正革命同学都敢！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都要动！还要反！坚决反！彻底反！反到底！管你什么‘红卫兵’‘黑卫兵’都不例外，你们这些强大的后盾，只不过是一座靠不住的冰山！”

“我们要用鲜血保卫党支部，保卫党！”这一句，原文无。

为什么阎阳生的引文和原文差距那么大呢？后来我发现，他是偷懒照抄了别人的不准确引文所致。

原清华附中预651班学生，现旅德学者仲维光在《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诞生史实》中说：“宣战在文章中写道，‘什么是红卫兵，是反动组织黑卫兵’，你们‘后面是靠不住的冰山’”，“我们要用鲜血保卫党支部，保卫党！”

仲维光身在国外，要找原文会有困难，只能凭记忆写来，倒也情有可原，阎阳生完全有条件查到原文，可能他手边也会有《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本小册子，为什么就不好好翻一翻呢？

原清华附中高631班学生郑光召（现用名郑义），在他的《清华附中、红卫兵与我》一文中也提到了宣夏芳。郑在文中展开了他想象的翅膀，说得更玄了：“红卫兵们通过渠道，将她的大字报送给刘少奇，刘将她定性为反革命。这位清华附中少有的工人出身的女同学后来遭到了无情的报复。”郑在文中并没有解释他的这种说法根据何在。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任何支持这种说法的材料。

## 九

《100天》中说，工作组进校后的第一次全校大会是6月9日开的。我在过

去的文章中也用过这种说法。

现根据各种材料综合判断，工作组进校后的第一次全校大会是在当天晚上，即6月8日晚上召开的。其中最有力的根据是刘晋的回忆。刘晋在《红卫兵运动兴起亲历记》一文中说：“6月8日，我进驻清华附中了解情况后认为，这种混乱的局面不能再继续下去。当即决定让学校通知在大操场开全校师生大会，我以海淀区中学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和工作队名义，宣布成立清华附中文化革命工作组，负责领导清华附中文化革命工作，我兼任组长。”（《炎黄春秋》2008年第五期）

## 十

《100天》中说：“当时红卫兵并不知道工作组的做法直接来自中央。6月下旬，胡克实传达了刘少奇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认为工作组已控制了局面，提出‘复课闹革命’和‘消化红卫兵’”。

阎阳生的这个说法可能来自刘晋。

刘晋在《红卫兵运动兴起亲历记》一文中说：“清华附中的运动开展得比较正常。6月下旬，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文化革命的指示，主要精神是逐步引导学生‘复课闹革命’，对各大中学校普遍成立的‘红卫兵’要采取消化、融合的方针，即把‘红卫兵’中的头头，表现较好的，吸收到共青团领导机构中来。”

刘晋的记忆有误。1966年6月下旬，运动才刚刚开始不久，中央刚宣布停课半年搞运动，根本不可能有“复课闹革命”的提法。“复课闹革命”的口号是1967年3月份才提出来的。

对红卫兵等组织采取消化、融合的方针是有的。6月27日，胡克实在听取刘晋的汇报后说：“我看就是要消化红卫兵，能不能把党团组织恢复起来。对红卫兵的政策，采取教育提高方针，作为依靠力量之一，把红卫兵消化在党团组织之中。”（《胡克实在刘晋汇报时的讲话记录》，1966年6月26日、27日）

## 十一

《100天》中说：“当高二的红卫兵刘刚、张树平等把这张‘造反精神万岁’

大字报抄到清华大学时，给了当时被清华工作组压制的蒯大富以极大的支持。”

刘刚和张庶平都是清华附中高 656 班的学生，张庶平是红卫兵的成员，而刘刚不是。刘刚后来成为红卫兵对立面组织井冈山的负责人之一。

《100 天》中说：蒯大富是在刘刚的帮助下，建立清华大学造反组织井冈山的。

这太夸大了刘刚对蒯大富的作用了。

## 十二

《100 天》中说宋柏林 7 月 11 日的日记中记述了批判班主任丁淑慧的内容，实际上，宋柏林是在 6 月 11 日的日记中记载的高 631 班批判、斗争丁淑慧一事。

《100 天》中将红卫兵与工作组摊牌的日期写成 7 月 24 日，明显是记错了。当时的说法是开交心会，时间是在 7 月 18 日晚上。这个内容在宋柏林日记中有记载（宋柏林《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香港德赛出版有限公司 2006 年版第 98 页）。而且，卜大华、高洪旭等红卫兵负责人在 7 月 24 日时已经到河北的沙城军训去了。

《100 天》谈到冯玉中时，将他的职务写成“政治主任”，显然不对，冯玉中是清华附中的教务处副主任。

《100 天》中说：“清华附中红卫兵开始独立掌权，年龄最大的也不过 18 岁。”此说不确。高中二年级的阎阳生本人就出生于 1947 年，1966 年他也有 19 岁了。估计高三年级的红卫兵中或许还会有比他年纪更大的。

## 十三

《100 天》中说：7 月 27 日，“正在北展剧场的中学生代表大会上做报告的海淀区中学工作团团长周捷被匆匆赶到的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当场宣布罢官。”

周杰当时是中央团校副教育长兼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1966 年 6 月初任海淀区中学文化革命分团团长。

现在许多书刊上都沿用了所谓“王力罢了周杰的官”的说法，有的地方用了“王力遵照江青的命令去罢了周杰的官”。这样的说法都是不准确的。据王力本人晚年回忆，派他和吴德到北京展览馆去支持彭小蒙，罢周杰的官，是根据毛泽

东的指示。（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 2001 年版下册第 611 页）

#### 十四

《100 天》中说：“王铭、卜大华 8 月 3 日从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那里看到（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手抄件”。这个说法不知从何而来，也没说清楚是毛泽东的手抄件，还是王任重的手抄件，还是秘书的手抄件。

王铭、卜大华在王任重那里看到的是铅印的中央文件，即当时正在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之二。

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的亲笔原件从未见披露。在 2003 年出版的《毛泽东传》上刊载了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的手抄件的第一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435 页），该手抄件字迹明显不是毛泽东本人的。毛泽东在这份抄件上有几处小的修改。

#### 十五

《100 天》中说：“高一才貌出众的女生 Y 由于不堪红卫兵的轮番批斗，在 8 月 8 日晚上跳窗逃到圆明园，然后到五道口冲向驶来的火车。”

文中的“Y”，即清华附中高 652 班的杨爱伦。她在 8 月 8 日自杀未遂，受了轻伤。自杀的原因及在此前后的详细情况至今仍不清楚，杨自杀的消息是在接到五道口派出所的电话后才知道的。但据我向高 652 班的同学了解，杨自杀前并未遭到“红卫兵的轮番批斗”。在那两天，可能是有班上的同学给她贴了大字报。具体因为什么问题，及杨本人当时遭受到何种压力等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了解。

#### 十六

《100 天》在谈到校园暴力时说：“8 月 26 日开始，发生了被称为‘清华附中模式’的校园暴力。”

“清华附中模式”一词是由旅美学者王友琴首先使用的。王友琴在研究文革

中的暴力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她所调查了解的材料对人们了解文革中的最残忍、黑暗的一面会有帮助。但她的调查和研究也存在一些急于求成和不够准确的问题。（王友琴在《清华附中模式》一文中就有诸如：清华附中红卫兵发明了“红五类子弟”、“黑五类子弟”这样的新名词和新概念；清华附中红卫兵曾经在火车站用开水浇烫被驱逐的人；清华附中红卫兵在高二学生郭兰蕙服毒自杀未死时，告诉医院郭是“右派学生”，遂使郭不治而死等道听途说来的不实之词。）

王友琴认为，在全国学校普遍发生的校园暴力，就是清华附中的模式。

应该承认，工作组撤出以后，发生在清华附中的各种暴力行动，红卫兵作为当时的掌权者，是应该负责的。但红卫兵的主要负责人对打人问题的态度是比较明确的，这从8月6日发表的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三校红卫兵的《紧急呼吁书》和8月27日发表的《北京红卫兵战校红卫兵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中就可以看到。

## 十七

《100天》在谈到《十点估计》时说：“几乎就在宣传《十点估计》前后，打人风潮也席卷清华附中，刘树华老师跳入烟筒，高二女生郭兰蕙服毒自杀。”

刘树华的死是与打人风潮有关的，据清华附中教师中当时的革委会成员刘长生证实，刘树华确实曾经遭到殴打。

郭兰蕙的自杀身亡却与打人风潮没有直接的关系。郭兰蕙生性内向，身处一个单亲家庭，在清华附中曾经留了一级，很少与其他同学交流。在她自杀前，并没有出现批斗她或给她贴大字报的情况。按现在的说法，她自杀的原因有可能是抑郁症。郭兰蕙自杀后，革委会曾派人到医院，要求医院尽全力抢救。但因郭是喝来苏水自杀，把食道、气管都烧坏了，终于抢救无效而死亡。

## 十八

《100天》在结尾时谈到：“在一所著名高校的问卷调查中，竟有一半的大学生认为有必要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

这个说法不清楚：到底是调查了全校学生还是只抽查了部分学生？调查了多

少人？“一半的大学生”是全校学生的一半还是答了问卷的学生（一百人？十人？二人？）中的一半？

无论这样的调查是否令人信服，对于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来说，确实有责任把真实的历史告诉后人，同时认真总结历史教训，防止历史的悲剧再次重演。

---

【早期红卫兵专题·史林一叶】

## 毛泽东对联动的捉与放

刘 双

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由干部子弟撰写的与“文革”有关的“回忆”文章中，毫无例外地重复着一个调式：当官的爹妈倒霉了，自己也成了无辜的受害者。这是事实。但这只是历史事实的一个侧面。而另一个侧面，显露了不尽的卑劣与丑陋却被有意地掩盖了。只有老鬼（马波）在陈述历史的时候是诚实的。

“文革”是一个多视角的旋转舞台。社会上的各种利益集团都毫无粉饰地争扮着自己的角色。红卫兵的主体成员——“干部子弟”在“文革”中的表演显露了那个时代的阴暗与荒唐。

“文革”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一个争夺控制权的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中央文革都曾利用“干部子弟”打前阵，企图控制局面。但是，由于毛泽东的“乾纲独断”（陈毅语），使得他始终掌握着斗争的主动权。

“文革”初期，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中第一次提出了要当心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将他和刘少奇的最后摊牌仅置于一层窗纸之间。《五一六通知》也被很多爹妈是高级干部的“干部子弟”们看到了。怀着不同的政治目的，他们中的一些人自觉地活动起来。

1966年6月1日毛泽东决定在电台上广播聂元梓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在这之后，北京各大学、中学几乎都出现了一个极为奇特而默契的现象：敢于出来给校党委、**校领导贴大字报的几乎清一色地都是“干部子弟”**。例如：在清华园给当时的高教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贴大字报，将其定性为反革命黑帮的，就是刘少奇的女儿和贺龙的儿子。再例如，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



学，第一个出来给校领导贴大字报的是刘少奇的另一个女儿刘平平。当刘、邓派出的工作组纷纷开进大学和中学校园开始控制局面时，进入了临时权力机构的无一例外地也都是“干部子弟”。因宣传血统论名噪天下的谭力夫就是北京工业大学临时权力机构的成员。这些天然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春风得意、踌躇满志、脚踏第一批被打倒的“走资派”的身躯登上了权力的宝座。当党委、团委机构被“文革”的洪水冲跨后，“干部子弟”，尤其是“高干子弟”成为党的化身，秩序的维护者。他们要按照他们的构想来运作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

工作组和临时权力机构企图重复 1957 年抓“右派”的过程，开始在群众中寻找打击目标。“仅 20 天的时间里，在（北京）24 所高等院校便有 1 万多名学生被划为右派学生。上海、南京、西安、武汉、兰州等省市的高校情况与北京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见丁晓禾编著《老三届朝歌》第一卷《狂飙》，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第一版第 35—36 页）。“文革”被纳入了一条毛泽东不愿看到也根本不能接受的轨道，毛泽东认为：“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群众中抓“游鱼”的做法，用当年的时髦用语叫做：转移斗争大方向。毛泽东指责刘少奇在 6 月初到 7 月中的 50 天内实施了“白色恐怖”，并断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7 月 29 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大会的宗旨是宣布撤消工作组。刘少奇在会上讲了一句极为无奈的话：老革命遇到新问题。邓小平和他的女儿毛毛也参加了那次会议。33 年后，毛毛是这样回忆的：“……作为学校的红卫兵代表，我也参加了那次大会。我今天仍然清楚地记得，望着那空旷的主席台，万人会堂内鸦雀无声。我们这些‘保工作组派’，一边听着，一边流下了眼泪……”（见 1999 年第 7 期《中华儿女》中毛毛的文章《父亲邓小平在动乱岁月》）“七二九 接见”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公众面前进行的一次民意较量。当毛泽东出现在舞台上的时候，万人礼堂的屋顶几乎被震耳欲聋的“万岁”声掀去了。刘少奇被冷落了。在短短的几分钟里，毛没讲一句话，他只是在那个大戏台上来回走了几趟，走得方方正正，挥挥洒洒。

8 月 6 日，在北京天桥剧场召开的红卫兵辩论会上，江青当着刘少奇的女儿的面明示：党的高级干部的孩子要退出红卫兵的领导层。以刘少奇女儿为代表的

高干子女被排除出学生运动的领导层。

与此同时，毛泽东不失时机地发现了北京中学生中出现的，以中层“干部子弟”为核心、以宣传“造反有理”为宗旨的红卫兵组织。又是写信又是接见，煽动起一股更疯狂更嚣张更肆虐的情绪。在精神的重赏之下，红卫兵在“文革”中以一种无理的态势露现在政治舞台上。“八一八”那天，长安街上涌动的红流，天安门城楼上的“万岁”声足以证明：撤人之薪、燃己之焰——“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红卫兵的肆虐在“文革”初期是北京城独有的一道风景线。傲慢跋扈、冷漠清高，愚昧无知、凶横无常，就其民众性而言，红卫兵比后来的“造反派”要少得多。红卫兵运动是以与人民为敌的面貌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的。他们高举血统论的旗帜，引起人民群众的反感是理所当然的。

1966年的夏天，在北京城出现过被诗人食指喻为“波涛汹涌的海洋”的狂潮。那是一片红色的海洋。那铺天盖地的浪头出现在八月十八日的清晨的地平线上。东方红，太阳升，初升的烈日把万物染红，旗帜是红色的，袖标是红色的，领章是红色的，帽徽是红色的，古城墙也是红色的。这凝固的红色在夏日的高温下开始熔动，像红色的沥青流将文明的一切无情地覆盖了。林彪那鬼怪似的呼喊声在古都的上空回响着，挥之不去。夜幕垂降，红卫兵身披落日的余辉，挟天子之威，挥舞着手中的武装带，冲向社会。血从人的身体中喷出，染红了街道、校园。书在燃烧，文物在燃烧，在昼夜不停地开动的焚尸炉中，人的尸骨在燃烧。那腾腾的火焰也是红色的。这就是红八月，这就是高潮中的红卫兵运动。

和以往的政治运动不同，在“文革”的发动时期，毛泽东打的是“人权”牌，而把以往政治运动中惯用的“党的领导”的王牌扔到了一边。毛泽东为“反革命”学生平反，支持“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支持陈伯达对血统论的批判，等等。这些举措具有极大的蒙骗性，被它诱发出来的“大民主”的幽灵在中国大地上徘徊了十年之久。

对红卫兵的放纵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还没有糊涂到要把国家政权立刻就交给一群乳臭未干的黄口小儿来管理的程度，尽管他并不怀疑红卫兵对他的忠诚。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拒戴红卫兵献上的“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的袖章，表明了毛泽东在身陷阿谀时的冷静（见丁晓禾编著《老三届

朝歌》第一卷《狂飙》第 277 页)。红卫兵制造的红色恐怖没有能够转移毛泽东既定的方针。千百万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的鲜血没有改变毛泽东倒刘批邓的决心。红卫兵上当了，他们为毛泽东破坏了一个可以使自己的父辈得以苟延残喘的秩序。目的达到之后，毛泽东自食其言，把“我支持你们”的最高指示丢在了一边。将这些“红五类”送上了政治的审判台。又一批干部子弟被运动抛弃了。

社会对红卫兵运动的否定是双重的。

第一重否定来自党内的极“左”势力，它的着眼点在于红卫兵对“两个司令部”的倾向性；而另一重否定则来自人民群众，百姓的着眼点更在乎于红卫兵对社会，对民众的态度。第一重否定可以随着政治斗争的演变而被重新认识。而第二重否定因为具有超然于党内利益争斗之上的社会道德标准、是非标准，使这一重否定成为历史的否定，它存在于民众的心中，一旦定性，铁案难翻。

1966 年的冬天，刘少奇的倒台已成定局。红卫兵至高无上的地位也发生了动摇，“文革”形势的发展完全出乎红卫兵之所料。

公安部在“红八月”中曾发表公告《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其中规定：“不许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见丁晓禾编著《老三届朝歌》第一卷《狂飙》第 85 页)。红卫兵成了不被任何法律约束的无法无天之徒。抄家，杀人，破坏文物，无恶不作。仅事隔三个月，为了配合运动的发展，11 月 18 日，中共北京市委发表《重要通告》(见丁晓禾编著《老三届朝歌》第一卷《狂飙》第 94 页)，其中强调：对那些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的现象要立即处理。有些在“红八月”身负血债和劣迹斑斑的东城，西城，海淀红卫兵纠察队的成员被公安局拘捕。例如：坐落在天安门的西侧，中南海的东侧，人民大会堂的南侧的北京第六中学和北京第二十八中学，校内红卫兵的刑讯室曾经因其惨无人道、杀人如麻而恶名远扬。遇罗克烈士在他的遗作中曾经用最愤怒的语言谴责过红卫兵在北京六中和二十八中犯下的罪行(见遇罗克《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遇罗克遗作与回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9 年 1 月第一版)。这两所中学的红卫兵都有人因此而入监。毛泽东直接领导的中央文革和红卫兵(又称“老红卫兵”)的矛盾终于在毛泽东毫不退让的政治路线的贯彻中突显出

来。

早在1966年8月24日，以清华附中红卫兵为核心的十几所大学附中的红卫兵，在清华大学高干子弟的策动下围剿清华大学，撕毁了在校园里出现的，响应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号召，矛头指向刘少奇等人的第一批大字报。向全社会发出了反抗“文革”，捍卫爹娘的信号。

当1967年春天的“二月逆流”还没有到来之前，以干部子弟为核心的反中央文革的政治组织“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在北京成立，在1966年和1967年之交的冬季掀起了一股被称作“十二月黑风”的狂潮。“自来红”们“自来红”是“干部子弟”在文革中对自己的称谓，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封建血统论思想。见《自来红们站起来》，载《遇罗克遗作与回忆》）在那即将沉寂下去的红卫兵运动的海面上掀起了最后一道狂澜。他们身披父辈的将校呢军氅，臂戴无字的红缎袖章，脚登轮圈锃亮的锰钢车，或呼啸于街头，或集会于闹市。“红八月”的威风扫地，父辈权力的倾覆，“革命”对他们的戏弄、激怒了这些“血统高贵”的老红卫兵。他们不甘沉沦，施以最后一搏。这一搏意气任性有余，冷静分析不足，更谈不上反省和觉悟。当年留下的所有文字记录中，在各种各类反文革的“异端思潮”中，“联动”思潮的功利性是最明显的，因而它的表露必然是最苍白，最贫困的。除了留下了一些“中央文革的某些人别太狂了！”“戚本禹十七级，你他妈的算老几？”之类的口号，好像没有留下任何思想性的东西。而那篇当年流传甚广、现今已被收入各种版本的“文革”异端思潮文集的《中央，北京党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通告》，绝对是出自局外人的手笔，其中破绽百出，当时就被很多头脑较冷静的人看破。但是，它的作者企图借“联动”之口，表明只“忠于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暗示毛泽东已经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的错误，确实别出心机。

“联动”一旦情绪大哗，为了营救他们的同伙出狱，就成为一次不大不小的“文革事件”。“联动”分子六次冲击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公安部部机关。他们呼啸而来，席卷而去，进出皆如入无人之境。他们的行为使京城百姓大开眼界：貌似严肃的政治斗争已成家中儿戏，威严的专政机关也成了赶集的庙会。当年驾驶摩托车率众第一个冲进公安部的就是在九大上当选中央委员的公安部副部长

的公子。虽然此公子因此也受了一些委屈，但是最终还是不了了之。而几乎同时期发生在青海省西宁市的一次平民与省军区的对抗事件中，被部队当场击毙的“暴徒”就有上百人。

“联动”的行为激怒了中央文革，在毛泽东亲自批准刊登的1967年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元旦社论》中，最高舆论喉舌将“联动”定性为“反动组织”。随后，专政机构又抓了一批“联动”分子。这时，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出现的第一批红卫兵的骨干分子几乎无一幸免。

1967年二月，“四老帅大闹怀仁堂”。有人直接为“联动”分子叫屈，并指责说捕抓联动是“不教而诛”。

1967年4月下旬的一个夜晚，近百名“联动”分子从北京公安局的看守所里被集中送往人民大会堂。这些“少年政治犯”在这座国家元首迎接、宴请、会见外宾的豪厦中受到国家总理和中央文革主要成员的接见。江青流着眼泪说：“你们受委屈了”。周恩来说，抓“联动”是不教而诛，他也动情地流下了眼泪。“联动”分子身心震颤，痛心疾首。他们相互嘘吁、热泪涟涟。他们被宣布当场释放。联动分子自然是感恩戴德，在三呼万岁之后，昂然跨出人民大会堂的门坎。随后，北京各城区的公安分局也将各种类型的亲“联动”分子统统释放。

消息传来，京城百姓目瞪口呆。这个玩笑实在开得太大了——当时的中国人还不太习惯于那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治游戏。人们只是在古代章回小说中看到过忽而满门下狱，忽而鸡犬升天的情景。释放联动还有一个潜在的原因。联动分子的大多数都是一年前“八一八”在天安门城楼上受到过毛泽东接见的红卫兵，尤其是清华附中红卫兵，是他们最先喊出了“造反有理”的口号，并使之成为“文革”中喊得最响叫得最广的纲领性口号。时间刚刚过去不到一年的时间，昨日革命小将，今日反动分子，于情于理都讲不过去。从“文革”的长远利益出发，红卫兵运动是不会因此而被否定的。周恩来在接见时，特别追问清华附中红卫兵来了没有。红卫兵创始人1986年曾撰文叙述过当时的场景（见清华附中红卫兵创始人卜大华的回忆文章，1986年第十期《中国青年》杂志）。

在人民大会堂，由党和国家最高层领导人接见政治上“持不同政见”的学生的事情，在“文革”的历史上发生过两次。

联动的被接见是第一次。“联动”的政治生命虽由此而告结束，但是就其成

员的命运而言，并没有因此影响到他们今后的前程，无论是在“文革”中，还是在“四人帮”倒台之后，确属恶始善终。

第二次接见是在1968年夏天。由于毛泽东派遣的“工宣队”被清华大学的造反派用武力阻挡在校园之外。毛泽东亲率林彪、周恩来及中央文革的领导成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蒯大富等五大学生领袖。伟大领袖指责造反精英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五大领袖”的政治地位随之一落千丈。“四人帮”倒台后，几乎都被投入监狱，恶始恶终、身败名裂。

黑格尔说，历史上的伟大事件总要重复出现两遍。马克思补充道，一次是以悲剧的形式出现，一次是以喜剧的形式出现。然而，重复出现的历史事件未必一定都很伟大。而“文革”中的这两次执政者与学生的“对话”也没有丝毫的悲剧色彩，倒是更像两出闹剧和丑剧。

“联动”的开释是共和国政治舞台上绝无仅有的一幕。毛泽东在1957年提出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之后，只有这一次没有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但是，“联动”和中央文革的矛盾到底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人内部矛盾”呢？好像无论哪一种归属都显得那么不伦不类。“文革”中被严打的“反革命”分子何止千百万，同像张志新、李九莲、锺海源那样被处以极刑，死前还要被割断咽喉，摘去内脏的阶下囚相比，“联动”分子是“法”外之徒、阶“上”之囚。

在经历了“向左，向左，向左”（马雅可夫斯基语）的1966年后，1967年的政治风向开始转向了。毛泽东为“文革”之大局开始调整自己的政策和策略。

“释放联动”之后，逮捕“王、关、戚”，批判“揪军内一小撮”等一系列反“左”措施收到了应有的回报。在1968年冬季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全会通过了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的决议。除了一位年衰体弱的老妇人，到会代表都举手投了赞成票。

“联动”的捉与放涉及的人员不过几百人，但在“干部子弟”的心理上造就了一种更加特殊的情态。这种情态与他们近二十年来培养起来的那种唯我独尊、舍我还谁的心态是一脉相承的。出入三座门（注：三座门，位于北京城北海公园和景山公园之间，军队高级干部俱乐部在此）和养蜂夹道（注：养蜂夹道，位于北京北海公园和原北京图书馆之间的一条胡同，中央高级干部俱乐部在此）的自

由只能带来物欲的满足，出入监狱的自由才最大限度地显示了他们的与众不同，满足了这些干部子弟在精神上要凌驾于全体民众之上的欲望。王子与庶民是不能同“罪”的。

对“干部子弟”的“特赦”在“文革”中并非这一次。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在她的长篇回忆录《点点记忆》中曾经提到过在北京西苑有一个“关黑帮子女的地方”。这个地方并不在北京的西苑，而是在北京的北苑。这里原是北京公安局管辖的“北京市少年管教所”，1968年六月在这里开办了专门接收干部子弟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对政治的和刑事的青少年在押人员进行开释前的“思想教育”。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她的回忆文章中也提到过这个地方。今天，从“北苑学习班”走出来的人，有的已成为亿万巨富，荣华富贵；有的已经步入军界高层，披星挂花；有的官居高品，权倾一方。

笔者曾在1968年7月的第一个星期天，亲眼见到过第一期学习班被释人员乘坐卡车从北苑驶向半步桥监狱（释放地点为半步桥监狱）途经天安门广场时的场景：由康生亲笔圈定的40名被“特赦”人员，热泪盈眶，40只喉咙发出一个共同的呼喊——“毛主席万岁！”这并不是每一个涉足过铁窗的人都能够享受的待遇。这是一种奢侈。这种高级的精神奢侈足以抵消牢狱之灾带来的惊吓和恐慌。在经历了风风雨雨之后，在已经培养起来的至上情感的世界中又增添了几分对伟大领袖的敬与畏，也对这个带有明显的封建主义色彩的司法体制和政治体制产生了一种深层次的信赖和寄托。

摘自作者《质疑对〈相信未来〉诗的诠释》一文中“背景”一章，原文在《黄河》2000年第一期发表时有删节。本刊摘自作者原稿，标题是本刊另拟的。

---

【早期红卫兵专题·蓦然回首】

## 关于西安红色恐怖队的口述回忆

董胜利

采访时间：2004年10月3日

采访地点：北京. 百万庄申区安志文家  
董胜利口述，白磊记录整理

红恐队（红色恐怖队的简称，1966 年 9 月 20 日在西安成立，以高干子弟为主要成员）支持北京西纠（首都中学生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的简称），不仅在组织形式上学西纠，而且很多地方都学习西纠，当时红恐队和西纠以及北京的高干子弟来往很密切，我的印象中似乎还请过西纠的人指导红恐队的行动。后来联动成立后，几次冲击公安部，红恐队还派人到北京参与冲击，以支持联动的行动。当时红恐队有一部分人来京后，就住在前门外的小旅馆内，我们自以为没什么事，其实公安部的人从一开始就盯上我们了。有一件事可以说明，当时我们来北京参加联动的活动，和他们一起几冲公安部，有一次在冲完公安部，晚上我们回到旅馆，在北京的这些人就发生内部矛盾，大家争吵不休，于是又重新推选赴京行动的领导人，那时候叫总勤务员，这边选举完，第二天公安就把我们抓走了，当时审讯的时候念了一份名单，就是我们前一天晚上推选出的名单。

红恐队的政委是西电（西北电讯工程学院）的大学生，叫什么我忘记了，外面盛传西安中学黄某某是红恐队的，其实不是，她哥哥黄磊是红恐队的，在广济街有据点，其实就是抄家后的房子，黄磊用这个地方审讯抓来的黑五类和放抄家抄来的物资。

金光亮（音）是西电的学生，金铭（音）的儿子，他当时是西安市造反派司令，司令部在体育学院。

当时西安有一起徐自简事件，也是红卫兵暴力事件之一。徐自简是山东人，当时在龙首村的简易居民区住。1966 年 9 月份还是 10 月份我记不清了，当地居委会向红卫兵举报，说徐的老婆有作风问题，是“破鞋”。红卫兵就去了，拿皮带抽徐的老婆，徐最开始还支持红卫兵的行动，还说这种事情就要红卫兵管管，煞一下她的歪风，看她以后还乱跟男人拉拉扯扯不。后来徐看红卫兵下手打的太狠，就还手拿板凳打了红卫兵，陕西省歌舞剧院的苗龄王（音）就带红卫兵打徐，徐当时就拿剪刀捅了苗，苗指示红卫兵殴打徐，后来又将徐带到十中门口，吊在栏杆上打了很长时间。后来红卫兵遣返西安市的黑五类及其家属子女，徐自简也



准备遣返回山东老家，在火车站东边一个关押四类分子黑五类的仓库关着，可能第二天就要送回去了吧，苗晚上就觉得不能这么便宜徐，于是就叫上苏兰州（音）和火车站纠察队的头头何晓东去找徐自简，当时仓库里满地都是准备遣返的四类分子和黑五类，还有他们的家属和子女，不许他们说话，让每人嘴里都咬着鞋，鞋掉下来就挨打。凌晨四点左右吧？苏兰州和苗龄王和一个姓王的用手臂粗的木棍将徐殴打致死。后来公安局以正常死亡报上去了。

当时还发生了学生把汽油桶绑在老师的背上，用火点燃汽油桶都把老师活活烧死的事情，这是九中学生干的。

西大街的城隍庙当时是西安最大的抄查物资仓库，所有红卫兵抄家来的东西都放在那里，衣服、家具、收音机、图书、字画堆积如山，红卫兵来交都是打个收条，其实就是白纸上写好内容，盖个章子就算收条。内容无非是今日收到什么什么战斗队交来抄查物资多少多少，有的甚至只写今日收到某某战斗队交来字画一箱，金条一箱，或者首饰多少件，至于什么内容的字画，多大尺寸，什么质地的首饰，是金是银是玉，重量什么的都不写。后来很多看仓库的就乱拿，有的打个白条，有的甚至连白条也不打直接就拿走了。很多抄家来的东西就这么不翼而飞。后来在南院门那里又找了一家银行，专门放抄家来的金银宝石和现金，有红卫兵点钱点累了，就睡在抄家抄来的现金上。

当时西安红卫兵司令部的司令叫张文光，是省军区副司令员张开基的儿子。十中的红卫兵组织就是以他牵头搞起来的，后来还有师大一附中、师大二附中、西安中学、二十中，西安红卫兵司令部和红色恐怖队也是以这些学校为主。

文革刚开始的时候，市委教育卫生部的副部长方黎，也就是当时市长徐步的爱人，找师大二附中的几个高干子弟在西安中学开会，动员他们要紧跟毛主席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她是当时市委主要负责和红卫兵联系的领导。

红色恐怖队的名称有人说是效仿上海中央特科的红色恐怖队，要以红色恐怖压倒白色恐怖，据我所知，其实红色恐怖队的名字是来自毛主席关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那篇文章。红色恐怖队的袖章是效仿西纠的袖章，红布，印刷体的字，“红色恐怖队”那几个字是长仿宋还是什么字体我忘了。当时还找工农子弟来担任红色恐怖队的主要领导职务，孙克（西北局干部）的儿子孙亚明是组织部长。后来好像还让张水平当过红恐队的头头，张水平是安装技校的学生，文革

后还当过省委书记的秘书。西电当时也选了一批人，十中选的是李建军、黄玉魁等几个西北局的子弟。

哪天有时间带你一起喝茶，介绍你认识更多当年西红司（即西安红卫兵司令部）和红恐队的人，很多事情他们亲身经历，有的甚至还打过人甚至打死人，他们讲出来一定比我更精彩！（旁边有人说：现在把那些事再拎出来会不会惹人不高兴？）这些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年了，再不讲就没人知道了，不管是非成败，都应该对自己过去的行为有诚实的反思，这才是正确对待文革这段历史的态度。

---

【早期红卫兵专题·文摘】

## 我见过的“红色政权保卫军”

陈益南

刚开始组建的红卫兵，都要求成员家庭出身是属于“红五类”，即父亲必须是工人，或贫农、下中农，或革命干部，或革命军人，否则不允许参加。因而，红卫兵又成了一种地位的象征，成了青年学生羡慕不已的对象。尤其，最初的红卫兵组织的领导人，大都是党政军领导干部的子女，他们身着父辈那儿弄来的无帽徽领章的绿军装，再佩上当时珍贵“的确凉”做的红袖章，率领着浩浩荡荡的红卫兵队伍，在大街高唱“拿起笔杆作刀枪，齐心合力打黑帮”的歌曲游行时，更令社会各界惊讶赞叹。

长沙市的红卫兵组织叫“红色政权保卫军红卫兵”（简称长保军），中学生的长保军司令，是解放军省军区一位副司令的儿子，大学生的“长保军”总指挥则是湖南农学院的一位姓刘的女大学生。他们仿效军队组织，将每个学校的指挥机关都称为“红色政权保卫军××学校军分部”，总部则设在省政协大楼里面。他们的来头，他们的背景，以及他们势不可挡的锐气，使省政协的老头们躲都躲不赢，哪里还敢说个“不”字，因而一幢大楼便成了红卫兵的司令部。这个“红色政权保卫军”红卫兵有司令部、政治部、组织部、宣传部、保卫部、动态部、甚至还有“作战部”，各类办公机构的牌子都挂起来了，俨如解放军的一个军区司令部。

红卫兵在学校的活动，开始主要就是斗老师、斗校长、斗所谓“资产阶级权威”，抄老师、校长们的家，抄出身不好（即父母是国民党时代的官员、军官、地主、富农等四类分子与资本家、右派分子等身份）的同学的家等等。

红卫兵之所以在学校里向老师，特别是向那些个人历史上曾有过多多少少一点“政治问题”（如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或做过国民党政权的职员等等）的老师“造反”开刀，实际是受到当时的中央政策的指使与鼓励的。1966年6月，尚还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在一次关于文革运动的会上，甚至也就明确地指示：“中学文化大革命的任务主要是审查教职员队伍”“中学教师要集中交待问题，像四清中公社开三级干部会一样”。当然，刘少奇讲的审查方式与程序，并不是这种红卫兵的造反形式，可是，只要有了“审查老师”这道旨意，由青少学生们组成的红卫兵们，便对自己的师长们演出了一幕史无前例、惨绝人寰的大暴行，使成千成万曾被誉为“培育祖国新一代的园丁”的老师，惨遭批斗、抄家、关押、刑罚，甚至迫害致死，无数的老师被逼得无家可归，流离失所。

随着文革的发展，最大的被打倒的对象，就是国家主席刘少奇。但是，在文革之初，也的确是刘少奇，却试图将文革纳入原有的“反右派”与“社教”那种阶级斗争模式，因而，文革之初的许多整人之责任，也就与他有些关联。

我当时已是一个工人，没有处在那场惨剧的中心（学校）里，但从我那些往日的同学、街邻伙伴们的言谈中，从几个月后就被揭露出来的惊心动魄血淋淋的大量事实而写成的大字报与传单上，我深深地感受和体会到了红卫兵那场“审查老师”风暴所具有的恐怖和惨烈。

长沙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红卫兵，也是最早成立的所谓“老”红卫兵。

我有一天去自己原就学的市一中，与几个尚在该校读高中的老同学聚会。当我与王文烈、吴侯成等同学站在学校操场内等其他同学时，突然，由一个姓石的女红卫兵带着十几名男生冲了过来，指着吴侯成吼道：“你这个狗崽子，今天跑到学校来干什么？！”吴的脸刹时变得雪白，他连忙小声回答：“是我们初中同学……”话还没有说完，那女红卫兵就指着吴厉声说：“你他妈有什么资格进一中的校门！”随着，那几名男红卫兵迅即冲到吴的跟前，将他拖走，一顿拳打脚踢，打得吴侯成同学血流满面。我见此情形，便欲上去制止，王文烈同学却一把拖住我，并说：“他们都是军区子弟，惹不得！他们经常打出身不好的同学，吴

侯成家里出身不好，在学校常受他们的欺压。”王文烈虽也没在一中读书了，但因其父是一中的教工，也为所谓政治问题在挨整，故十分清楚“红五类”红卫兵欺压老师与所谓“黑七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黑帮分子、资本家）家庭出身的同学这类践踏人权的暴行。

我虽然也属所谓“红五类”子弟，但目前显然斗不过那帮佩着红卫兵袖章的军干子弟，我的父亲只是一个普通工人，此时又势单力薄，因而只能忍气吞声愤怒地喊喊口号“要文斗，不要武斗！”并注视着事态的发展。

那帮“红卫兵”大概还有什么事去，当将吴侯成打得跪在地上后，便几声口哨扬长而去。我与王文烈赶紧跑过去扶起吴侯成同学，深怀歉意地询问他的伤情。吴惊恐地对我们说：“这辈子我再也不到一中来了，这一中，已不是我们这些学生的了。”可见，那帮红卫兵对他的伤害有多大。

摘自作者长篇回忆录《青春无痕——一个造反派工人的十年文革》，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6 年出版。

---

### 【文摘】

按：本文作者陈冀德，女，1936 年生于浙江上虞。文革时为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成员，1966 年 12 月参加写作班“集体造反”，先后在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市革委会专题写作组、驻华东纺织工业学院工宣队、上海《红旗》组稿小组组织的文艺评论写作小组工作，1972 年起任上海市委写作组文艺组组长，负责编辑《朝霞》（月刊、丛刊）、《外国文艺摘译》等刊物。后期担任写作组领导核心成员。文革结束后被关押审查。1981 年被开除中共党籍。已退休。

## “阴谋文艺”遭遇阴谋记——《朝霞》事件

陈冀德

《朝霞》丛刊（原名《上海文艺》丛刊）第一辑于一九七三年五月出版。印数 30 万册。发行情况很好。各方面的反映也不错。虽然筹备出版丛刊的事没有报批，但丛刊出版以后，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等上海市委的领导都送了，人手一册。这既是对领导的尊重，也带有一点试探的性质。虽然第二辑丛刊的组稿和编辑工作照常进行着，但如果张、姚和市委领导看到丛刊第一辑而提出批评的话，我们就马上收手。

没有听到批评。不仅没有批评，姚文元在看到丛刊第一辑题头为‘朝霞’时，对他身边的人说，你们知道朝霞是什么吗？它是早晨天空中的一种高积云。这种云的特点是它只反映太阳光中的红色。霞光灿烂。《朝霞》，这本书的书名起得好。有姚文元的这句话，我和萧木两个人的惴惴之心，总算落定。后来七四年创刊的月刊因此而得名。《上海文艺》丛刊从七四年起也因此而改名为《朝霞》丛刊。编辑部的老、小编辑们自然也倍受鼓舞。

《朝霞》丛刊第一辑的扉页，并没有按当时出版物的习惯做法：大段落的、多段落的引用毛主席的语录。而是复制了毛主席亲笔书写的“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一句话。这便是我们办刊物的宗旨了。姚文元对于朝霞的诠释，则是对我们的鼓励和鞭策，更是提醒我们，怎样才能切切实实地去达到我们的目标——只反映红色，只为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而歌唱。

朱永嘉对丛刊第一辑中，万吨轮船长樊天胜写的散文《故乡散记》情有独钟。《故乡散记》是写作者的故乡崇明岛在解放以后至文革的巨大变化的。朱永嘉专攻历史，对文学作品的兴趣本来不大。也许是《故乡散记》这个题目引起了某些独特的联想。读完以后，连连说好。而作品中最为他欣赏的一句话，就是篇尾的“太阳就在你身边升起。”太阳照耀下的高积云，美仑美奂，这就是《朝霞》！

正当大家都沉浸在收获的喜悦中的时候，萧木，《朝霞》的创始人和主编要走了。听说是奉调去北京辅导王洪文读马列的，也做些起草文件一类事。这个决定，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无异于当头一盆冷水。我是个有点自知之明的人。刊物的编辑、出版，虽然初具规模，但要我接替萧木的角色，心里慌慌的。

萧木临行前，徐景贤在衡山饭店设家宴为他饯行。告别时，我死乞白赖地与他“约法三章”：1，审阅丛刊的每期发稿计划。2，审读丛刊的每期清样。3，继续不断地为刊物写稿。按常情，萧木要走了，有关刊物的事，总该交代几句。出

乎意外的是，该说的，一句没有。而对我的三点要求，倒是一口答应。我也没有考虑很多，只要有萧木的把关，虽然只是私交，我的心就定多了。我观察编辑部的反应，一切都像萧木在的时候一样。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要干什么。因萧木离去而在我心中产生的惶恐之情，减轻了许多。

一九七三年八月，《朝霞》丛刊第二辑如期发行。七三年十二月，以电影和话剧剧本为主的《朝霞》丛刊第三、四辑同期发行。一切还算顺利。

有了编辑丛刊的实践，不仅编辑部从开始时的初具规模到完全正规化。同时，一支庞大的创作队伍也涌现了出来。每位编辑的办公桌上，全国各地的来信来稿，都堆得小山似的。三、四个月才出一期的丛刊，无论从内容的涵盖上，还是从反映现实生活的速度上，都赶不上趟了。

朱永嘉同意，从七四年起，增出《朝霞》月刊。并且在写作组主编的理论刊物《学习与批判》上刊登征稿启事，号召广大工农兵业余作者和专业作者踊跃投稿。朱永嘉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对《朝霞》月刊提出了带有方向性的意见——要触及时事。编辑部一致认为朱永嘉的意见非常及时。《朝霞》月刊应该不失时机地弥补丛刊在反映现实斗争生活上比较滞后的缺陷。同时，决定在《朝霞》月刊、丛刊上发起《努力反映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生活》征文。

为了力争做到触及时事，编辑们分批、分头深入生活。率先到生活中去感受时事。我与林正义两人是一组，目的地是崇明农场。

登上去崇明的轮渡后，在隆隆的轮机轰鸣声中，林正义给我讲了一个关于他自己的小故事。他曾被作为林彪女婿的候选人，与林立衡有过一些接触。在我听来，故事本身并无离奇之处。林立衡，不管她是谁的女儿，她总是个女孩子。男婚女嫁，人情之常。即便是父母替子女物色对象，由子女相亲的方式决定取舍，也不算过分。使我不舒服的是，怎么共产党人也搞选驸马这一套？这种只有在古装戏里才会有情节，怎么就跑到林副主席的家里去了？要不是林正义就坐在我的身边，事情是他亲身经历、亲口所说，我是不会贸然相信的。可能还会怀疑，说故事的人心怀叵测，意在诬蔑共产党和无产阶级司令部。

联想起一九六一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戴厚英回安徽老家探亲，回沪后，说老家有不少亲人都是活活饿死的。我以为她听信传说，夸大其辞。当作协的支部书记告诫她，以后不要再在公众场合说这种话的时候，我也觉得提醒得有道理。但

随后我看到泪流满面却一脸无助的戴厚英望着我说这一切都是真的时，我相信了。但我想不明白的是，这一切怎么可能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今天发生！是我的幼稚病又犯了吗？但什么是成熟？难道只有认为，本该是发生在封建帝王家的事，却发生在了革命领导人的家里，本该发生在旧社会的事，却发生在了新社会，都属平常，都看得很透，这才叫成熟？如果真是这样，我宁愿幼稚一辈子！

林正义的故事，使我看到他为人之坦诚和对我的信赖。而我在听了他的故事之后的感受竟会如此另类、如此离谱，恐怕至今他都不会知道。

从农场回来，已是七三年底七四年的初头上。马不停蹄地立即着手计划于七四年一月二十日出版的《朝霞》月刊创刊号的编辑和发稿。等到《朝霞》月刊创刊号出版，为第二期准备的稿子，已经放在了我的办公桌上。此时的我，真可谓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送审稿了。

有一天，朱永嘉把我找去，劈头问道：《朝霞》编辑部的林正义是怎么回事？把我问得一愣一愣的。回过神来以后，心里已经明白他的意思了，却继续装糊涂，说道：林正义工作挺好的呀，很得力，出什么事了？朱永嘉说：你糊涂！你怎么把一个做过林彪女婿的人，留在编辑部？你呀，你这个人叫我怎么说你好，这种事最犯忌，你知道不知道？

怎么一回事？林彪选驸马，该林正义倒霉？本来就因此事在心里窝着一肚子不满的我，终于找到了发泄的机会。我凶巴巴地反问朱永嘉：谁告诉你他是林彪的女婿？朱永嘉也急了，说，你别管是谁说的。赶紧，马上，他从哪里来，你给我送回到哪里去。别再给我惹麻烦。

真是岂有此理！我说，林正义一不是林彪的女婿，二也不曾想巴结去当林彪的女婿。他不过是选驸马这种丑事的受害者。听明白了吗？受——害——者！诛连九族，挨不着他。叫他走，还是叫我先走吧。

发泄了一通，回到自己办公室，面对一大堆的稿子，也就把这事丢之脑后了。总以为，事实总归是事实。谁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去吧。再说，朱永嘉这个人爱惜人才，不要说林正义还不是林彪的女婿，就算是，想来也未必一定会把他怎么样。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我到编辑部去商量第二期月刊发哪些稿子的时候，姚真神秘兮兮地对我说，老陈，小段要结婚了。我说，好事啊。别忘了给我喜糖。姚真说，你知道小段的

女朋友是谁？我说，不知道。姚真瞪着两只大眼睛，凝视着我，说，他的女朋友是反动资本家的女儿。我感受到了姚真这种试探性的目光，反问她说，小段又不是与反动资本家结婚，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姚真嘻嘻一笑，说，那你就等着吃喜糖吧。

在编辑部里，姚真是出名的机灵，段瑞夏显得木讷。但我知道他俩相处却很投缘。可能是从外面听到什么诸如段瑞夏是反动资本家的女婿这类传言。姚真要替段瑞夏打抱不平，装作油腔滑调的模样来探探我的口气。

现在回想起来，从朱永嘉责问我为什么把林正义留在编辑部时，《朝霞》事件早已在紧锣密鼓的酝酿之中了。试想，且不说别的，《朝霞》编辑部重用的人，一个是林彪的“女婿”，一个是反动资本家的女婿，这样的编辑部，还不得好好地整一整？编辑部的负责人能辞其咎吗？

山雨欲来风满楼。可叹的是，我竟浑然不觉。

实在是事情太多、工作太紧张了。除了《朝霞》月刊的稿子，继续出版的《朝霞》丛刊的稿子要看，还有我负责编辑的《外国文艺摘译》的稿子要看。看来稿，经常是一个中篇读一个通宵。天亮以后，睡上两、三小时，起来后错过了食堂的早夕时间，洗把脸，接着又埋在稿子里头去了。

编辑部的人，文艺组的同事们，都佩服我的处理稿件的速度。以为我有什么诀窍。其实没有。我的速度都是用时间换来的。我哪还有什么空闲去胡思乱想。即使想了，即使在朱永嘉提醒我以后，我应该有所警惕，但，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对我的打击会来自上方，来自同一方向、同一目标的革命队伍内部。

直到有一天，朱永嘉把王秀珍批示《朝霞》停刊整顿，另两个市委书记圈阅并同意按王秀珍意见办的市委文件摊在我的面前，我这才大吃一惊。心情顿时沉重起来。我到底还是捅了漏子了。

而且，不是一般性的问题，是大纰漏。要不然，不管文教口的马天水不会画圈，管文教口的徐景贤也一定会替我挡一挡的。

可是，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我是在问我自己，也像是在问与我相对而坐的朱永嘉。

这时的我，心乱如麻。全然忘记了自己此时此刻的处境了。

通常，在这个时候，当领导的会躲得你远远的，最多由党支部出面找你谈个



话，像宣读圣旨似地把领导的批示告知之后，就会采取相应的措施。王秀珍的批示是停刊整顿。那么首先是把我隔离起来。同时通知编辑部，停止工作，等候处理。

我没意识到，朱永嘉也没有这么做。相反，看他的心情似乎比我更为沉重。没有说一句埋怨我的话。却把他了解到的有关这个批件的背景情况告诉了我。

原来，市总工会下属的一个文化单位，写了一份检举、揭发《朝霞》有严重问题的材料给总工会（后来知道，是总工会会有意识地组织他们写的）。总工会添油加醋，上报给了王秀珍。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罪过自然多多。但主要的罪名只有两条：一是《朝霞》月刊第一期上发表了两篇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作品。分别是，姚真的《红卫兵战旗》和夏兴（段瑞夏）的《初试锋芒》。二是《朝霞》编辑部重用的人，政治背景复杂。这两条也就是王秀珍批示《朝霞》必须停刊整顿的依据。

听朱永嘉这么一说，我反而松了一口气。沉重的心情轻松了好些。心也慢慢地定了下来。对着愁眉苦脸的朱永嘉说，放心，没事的。别的不敢说，要说这两篇小说，我敢担保，绝对没问题。

朱永嘉说，你呀，你触到了人家的痛处了。

哪里？怎么会？我是个好斗的人吗！他们认为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两篇作品，其中，《红卫兵战旗》讲的是，红卫兵在工人老师傅的引导下，克服自身的小山头主义思想，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的故事。会触到谁的痛处？山头主义？山头主义不该受到批评吗？

朱永嘉又说，意在弦外啊。

《红卫兵战旗》中有没有提到庆祝半周年的事？我说，有。作品中确实写到过有一个红卫兵头头，为了要庆祝自己的一派成立半周年，因而差点影响了革命的大联合这样一个细节。朱永嘉说，你想想，谁曾经提出要庆祝成立半周年？我想不出来。我说，我不知道。朱永嘉说，春桥同志批评工总司要成立半周年的话，你没听说过？也许听到过，不关我的事，早就忘了。我说。朱永嘉接着说，春桥同志在知道了工总司庆祝成立半周年的事后，曾说过：这么着急？竟等不到一周年了吗？这样的话。你怎么就忘了呢？确实没有印象了。我心里却在嘀咕，即使没忘，看到作品中的这一细节，我也不会把它删去的。这种作风不该批评吗？

再说《初试锋芒》，它批判了文革前的民兵是“墙头上的官，抽屉里的兵”，形同虚设。歌颂今天的民兵，活跃在街道里弄，配合公检法与坏人坏事作斗争，成为公检法的好帮手。这又有什么不对？朱永嘉说，人家要当主力，你把他写成了助手，问题还不严重吗？什么？！民兵指挥部要去领导公、检、法！这不是天方夜谭吗？究竟是谁错了？！

我不服气。我要去找徐景贤。

马天水、王秀珍对于解读文艺作品，都是八杆子打不着的外行。徐景贤应该是懂行的。文艺作品是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窗口，不是某一派别、某一山头用来混淆黑白、颠倒是非，为自己谋私利的工具。怎么可以这样？！这还像是党的一级领导的样子吗？

徐景贤今非昔比，他来找你，一个电话即可。你要找他，就不比从前了。但我有办法。他一般在家里用午餐。我就利用他吃饭的时间，把他堵在了家里。

他对我的到来，似乎已经有所准备。一见到我就说，你来了，是小张（张家龙，徐景贤的秘书）通知你的吗？我说，我没接到小张的电话，是我自己来的。

随即开门见山，问他三位市委书记要《朝霞》停刊整顿，什么意思？

他沉默片刻后说道：有些事情，我不便对你说。但有一点可以告诉你，不管我同意还是不同意，《朝霞》的停刊整顿，势在必行。这件事恐怕还不仅仅是王秀珍的意思。她是从北京回来以后，才把批件传到我这里要我圈阅。不过，这件事，对你不会怎么样的。就算不再搞刊物，总有吃饭的地方。我就难说了。弄不好，吃饭的家伙都要保不住。

奇了！《朝霞》的事，怎么会牵涉到徐景贤脑袋不保？当时昏昏的，竟然一点没有朝这方面去想。只是说，那也不见得。无非不做官就是了。有饭一起吃饭，有粥一起喝粥。有什么了不起的！简直是昏话连篇！

看到徐景贤一脸无奈的样子，我的心就软了。虽然我和徐景贤的私交不错，但确如他见到我时所说的，有些事情他不可能把底交给我。这是党的组织纪律。他也有他的难处啊！

从徐景贤家里出来，心中一片茫然。

党教育过我在阶级斗争面前，在敌人面前应该怎么做。却从来没有教育过我当革命队伍内部为了争权夺利而拼个你死我活的时候，我该怎么做。

差不多在我去找徐景贤的同时，朱永嘉去找了王秀珍。朱永嘉答应，由他负责，责成编辑部作出深刻检查，至于停刊的事，是否缓一缓？以后再说？王秀珍哼了一声，说，你们这些捏笔头的人，写个检查是家常便饭。想就此了事？不行！斩钉截铁。一点挽回的余地都没有。

朱永嘉一筹莫展。

这时候又传来消息说，《朝霞》月刊创刊号在市面上被抢购一空，脱销了。有的人购买是出于好奇，但大多数是几十本一买，准备组织批判。

与此同时，写作组内部，也行动起来了。大字报贴到了文艺组办公室的墙上。我自觉地挪出了我的办公桌，撤退到了既是宿舍也可办公的小房间里。依然看我的稿子。我主意已定。停不停刊，我说了不算，再争也没有用。但要我写检查，要我到编辑部去宣布市委的决定，要我把姚真和段瑞夏推出来，决不。因为我们没有错。我有我的“杀手锏”，沉默。对于一个一句话都不说的人，能奈他何？我有的是看不完的稿子。我等着，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这一天终于来了。一天早上，朱永嘉站到了我的面前。一边递给我一个点心，一边说，你就在这里给我闭门思过吧。

这是把我隔离起来了。也可以说，是写作组把我保护起来了。

可是编辑部呢？姚真和段瑞夏呢？本来似乎坦然的心情，一下子又变得狂噪起来。我们究竟做错了什么？

我又算什么？隐隐约约听到，写作组已经派文艺组的余秋雨等人到《朝霞》编辑部“揭盖子”去了。而自己却在写作组这项保护伞下，躲在小楼里做缩头乌龟。把编辑部和两个小青年推了出去？可耻。

我不能沉默，也不该沉默。

不错，党从来没有教育过我，怎样与自己的同志去争权夺利。但党教育过我，做人一定要明辨是非，要有责任感。

问题是，此时此刻，我还能做什么呢？找朱永嘉？找徐景贤？还有用吗？要是萧木在的话……萧木，天哪！我在这时候想起了萧木！

萧木虽然远在北京，但因市委与在北京的几位中央领导之间的文件往来有机要交通，我送给萧木看的每期《朝霞》的清样，就是利用这条线路，非常便利。而且绝对保险。当天下午送到机要交通站，晚上他就可以看到了。

于是，我把这几天围绕着《朝霞》所发生的一切，原原本本给萧木写了一封信。利用去余庆路食堂午餐的机会，往机要交通站一送。我倒要看一看，有谁敢截留送往王洪文办公室的东西！

也许是对自己的这一招有点得意，也许是满腔的焦躁和愤怒，都倒在了给萧木的信里，心情似乎又变得平静起来。

其实，我给萧木写信，说到底也只不过是一种愤懑的宣泄。市委三书记责令《朝霞》停刊整顿的事，朱永嘉在看到市委批文的当天，就要王知常写信告知过张春桥、姚文元。此后几天，他们都没有任何反应。这才病急乱投医，到王秀珍那里去碰一鼻子灰。萧木实际上兼做着王、张、姚三个人的秘书，即使我不告诉他，他也不可能一无所闻吧？我并不寄希望于萧木来挽回这件事。后来才知道，在看到我的信之前，萧木对此事还真是一无所闻。可以理解。王秀珍去请示王洪文，当然不会对他说什么。张、姚收到王知常写的报告，不想表态，当然也不会去通知萧木。真所谓冥冥之中，如有天助！

最后，还有一着，求人不如求己。只要我顶着，就是不检讨。下面的戏，看你怎么唱！山穷水尽。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有时候，没有办法时逼出来的办法，往往是最好、最有效的。一种能奈我何的心情油然而生。猴年马月，你们就等着吧！咳！现在回过头去看看，真是天真得可以呀！

我又自顾自看起稿子来了。

大约是凌晨二点左右，听到朱永嘉办公室里电话铃响。稍有犹豫以后，我还是去接听了。

电话那头是萧木的声音。但他既不和我招呼，也不问我是谁。更不容我说一句话。便直截了当地说，你马上去把朱永嘉找来，春桥同志要和他通话。萧木应该知道接听电话的是我。因为只有我的宿舍才能听得到朱永嘉办公室的电话铃声。我给他的信他肯定已经看到。可是，一反往常，他不想和我说话。他在电话中生硬而又严厉的口气，又把我的心提到了喉咙口。

朱永嘉办公室与他的宿舍是有非保密电话可通的。我全然忘记。急急忙忙地奔到朱永嘉宿舍，把他找了来。

张春桥在电话那头说：关于《朝霞》的事，他知道了。叫我不需检查。那两篇小说他看也没有什么错。有关《朝霞》的问题，他已经给市委写了信。信的

内容很快就会传达下来的。

放下话筒，我和朱永嘉百感交集，我更是泪流满面。

回到寝室，依然兴奋得睡不着。浮想联翩。

萧木显然是在张春桥那儿打的电话，他的胆子可真不小。他难道就不怕王洪文要了他的命？

在写作组里，我和萧木的关系最为密切。不仅因为我们一起创办、编辑《朝霞》、《外国文艺摘译》。更主要的是，我们在性格上有些相像。不喜张扬。却也并非懦弱之辈。为人处事，抱定与人为善的宗旨。哪怕是自己所不喜欢的人。

记得施燕平在去《人民文学》之前，曾对我说，他非常看重并且留恋《朝霞》编辑部这种上上下下相处和谐、工作默契的氛围。萧木，是形成这种氛围的核心。作为领导，他没有架子。平等待人。作为同事，他没有私心。很有责任感。与他在一起工作，确实是一种享受。我想，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同志吧？为了对真理的追求，可以不顾一切。

可是，起初张春桥为什么对朱永嘉他们的告知没有反应？难道是执笔报告的王知常没有把事情说清楚。

三个市委书记白纸黑字的批示，又将如何收场？他们能承认错误？还是不了了之？

还有一个问题，我总是想不明白。政治斗争为什么老是要拿文艺作品来说事？一篇文艺作品的评论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而此刻，对两篇文艺作品的评价为什么非得作为中央高层领导的张春桥来搞定？在我们这个社会，文艺与政治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作协 49 天批判会（注：指 1959 年底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召开的以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人性论”为主题的文艺思想批判座谈会）后，被批判的老师、学者都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政治帽子。应该是这样的吗？今天，要不是张春桥站出来，那末，我会是什么？编辑部和两个小青年的命运又将如何？脱不了政治问题的干系吧！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有这么密不可分、没有彼此的特殊性吗？然而，无产阶级的领袖们都曾说，文艺服务于政治，是政治的工具。

.....

喧闹、嘈杂、加上哒哒哒上下楼梯的声响把我惊醒了。拿起床头的手表一看，已经九点半都过了。我打开房门，正好与王知常打了一个照面。他正在指挥组里的小青年，把墙上的大字报一一地撕下来。自己也手脚不停，嘴里还大声嚷嚷道：撕了。撕了。本来就只是做做样子给他们看的。看着王知常手舞足蹈的样子，我想笑，又笑不出来。莫名的惆怅，又十分的疲惫。我呆坐在椅子上发愣。

王知常他们下楼去了。楼下大厅大字报更多，够他们忙乎一阵子的了。

坦白的说，这些在昨天上午一涌而出的大字报，我还没有来得及看过一张。

但有件事情却是印象深刻。昨天傍晚时分，文艺组的一个小青年从北京探亲回沪。在大门口和我相遇，还打了个招呼。进门后，看到大厅里有人在贴挂大字报，他二话不说，随手拿起毛笔，就在一张大字报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写完了还回过头来朝我做了个鬼脸。

而此时此刻，那些没有被挨批的人看过一眼、墨迹似尚未干、有着某人的签名而本人又并不知道批判的是谁的这些大字报们，在这人世间静静地度过了一个夜晚之后，统统都将归到垃圾桶里去了。

有点像闹剧。其实很悲怆。物质的浪费且不说，如果说，时间就是生命，那末，是否有人算过，在这种无谓的运动之中，生命被白白地浪费掉了多少？

运动大家贴大字报，造声势，把写作组与我这个人区别开来。这很可能是王知常的杰作。其用心与徐景贤的画圈也许同出一辙。留得青山在，砍掉棵把树怕什么。

如果换了我，碰到这样的情况，会怎么对待？我不会这么圆通。更不会像王知常那样去运动群众。然而，为人处事的准则多多。在不得不圆通的时候，认死理，一根筋，未必就一定是对的。立场不同，思路也就不同。还是理解万岁吧。

.....

这时，有人叫我下楼开会。那是朱永嘉从康平路小礼堂回来了。他把昨晚，应该是今日凌晨，张春桥的来电向市委作了汇报，同时带回了张春桥有关《朝霞》事件给市委的信。张春桥在信中说，他是市委第一书记，责令《朝霞》停刊整顿的事情，他怎么不知道？（有意思！明明知道的事情，就说不知道。这就是张春桥的厉害之处吧？更有意思的是，上海的三个市委书记，竟没有一个敢站出来说，这文件是送过的呀！多有趣。）并且明确表示，以后凡属工作中的差错，不要把

责任推给下面。责任在市委，首先在他。

写作组内一片欢腾。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突然一夜之间鬼使神差般地咸鱼翻身，当然高兴了。

然而不知为什么，我是一点都高兴不起来。没有丝毫胜利者的喜悦。只感到心痛。只感到茫茫然。

.....

现在看来，《朝霞》虽属文艺刊物，但《朝霞》事件实实在在的与文艺无关。它纯粹是一次争权夺利的政治事件。

这是以王洪文为幕后，以王秀珍等人为首的总工会一伙人，打着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旗号，为夺取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而进行的一次前哨战。

他们似懂非懂、有意无意地掐去了“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这一最高指示中最为紧要的“阶级”两字，变成了工人领导一切。于是，民兵领导公、检、法，工会领导党委……仿佛什么都应在他们的领导之下。

看来看去，唯独这意识形态领域，是他们权力的空白点。无限膨胀的权势欲使他们在迷失自己的同时迷失了方向，不知不觉地竟把手伸到张春桥、姚文元的口袋中去了。

张春桥一个电话，一封信。轻轻松松地制止了《朝霞》事件的发生。但随后在给他的秘书何秀文写信的落款中，不无沉重地写上了“又是四一二这个日子”。几次炮打张春桥事件都发生在每年的四月十二日这个日子。张春桥似乎感觉到了什么。

他只当不知道《朝霞》事件的后台是王洪文。全然不顾王洪文可能会有怎样的动作。断然刹车。作为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他有这个权力。

这一下，可轮到王秀珍们哭着鼻子到处去求爷爷告奶奶了。“我们怎么会炮打春桥同志？”

在一帮小兄弟们莫名其妙的惊呼声中，原来准备走马上任，接管《朝霞》编辑部的一班弟兄们，顿时星散。

《朝霞》事件落幕。

为了争权夺利，兄弟阋于墙，同室操戈。这个几千年封建社会，在帝王将相、

豪门贵族之间不断上演着的故事，何以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今天，重新出现？

我不明白。

而唯一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反倒是被视作阴谋文艺的《朝霞》和大搞阴谋文艺的人，遭遇了一次货真价实的阴谋，并且被狠狠地咬了一口。

世界真奇妙，不说不知道！

摘自作者《生逢其时——“文革”第一文艺刊物〈朝霞〉主编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2008 年 7 月第一版。

---

【编读往来】

## 年终寄语

《记忆》自今年九月创刊，三个半月出了十期。我们最初担心的稿源问题已成杞忧——《记忆》不但稿源充足，稿件质量也在提高。其撰稿人以中国大陆为主，兼及欧美。其读者遍布亚、欧、美、澳，达数千之众。在拜金盛行、犬儒相庆，娱乐至上的时代，一个无名无利又无趣的电子学术刊物能做到这一点，原因是多方面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原因是：人们需要倾吐，需要交流。希望将自己的记忆与同类分享，希望将经验和思考留给后人。

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也是当代国史，尤其是文革史被歪曲、被掩饰，被遮蔽的三十年。这一政策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效果——崇尚“以史做镜”的民族成了史盲。“人相食，要上书的”。防民口，不要上书吗？刘少奇用刚刚过去的大饥荒警示毛泽东，希望毛认识错误，改弦更张。《记忆》不想警示任何人，更不指望谁改正错误。它只想保存当代人的记忆和思想，它的最大的希望就是在未来的一年中仍能存活下去，并赢得更多的作者和读者。

编 者

2008 年 12 月 26 日

---

【2008 年分类总目录】



《记忆》1—10 期

发刊词 ( 08/1 )

《纪念文革研究先行者王年一先生逝世一周年专辑》( 08/1 )

一瓣心香

启 之 香兰自判前因误，生不当门也被锄——纪念文革史家王年一先生  
顾训中 悼王年一师

乌扎拉·迪 从官方到民间——王年一的道路与意义

王年一未刊稿

《王年一文集》自序

文化大革命可以研究的题目很多

昨日心迹

王年一书信选辑

资料存目

王年一主要作品篇目

纪念吴小龙逝世两周年 ( 08/7 )

吴小龙 在北京 2006 文化大革命研讨会上的发言（摘要）

吴小龙 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散论

吴小龙 怅望千秋一洒泪——读《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

吴小龙 这个民族需要忏悔

邢小群 吴小龙逝世两周年追思

国史笔谈

丁 东 质疑成说，可圈可点——读史云、李丹慧新著《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 08/6 )

余汝信 新瓶里的旧酒——新书《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的旧思维( 08/6 )

阎长贵 贡献与缺憾——读《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 08/7 )

袁笠翁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评《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兼与作者  
商榷（上）（08/8）

唐少杰 反思和研究文化大革命史的一大进步（08/9）

袁笠翁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评《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兼与作者  
商榷（下）（08/9）

何 蜀 新松恨不高千尺——读《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求疵札记（08/10）  
文革起源研究

余汝信 高饶问题实质上是毛刘问题（08/4）

孟犁野 个人崇拜的盛大礼赞——舞台艺术纪录片《东方红》简析（08/8）

毛泽东研究

冷 卫 中国特色的毛泽东——从特里尔等学者之失谈起（08/6）

华国锋研究

陈益南 华国锋“忠厚老实”吗？（08/6）

晓 明 华国锋的功与过（08/8）

江青研究

阎长贵 1967：江青和周恩来的关系（08/3）

王广宇 在中央文革办事组与江青打交道（08/4）

阎长贵 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专政”（08/4）

学术研究

宋光瑛 银幕中心的“他者”——革命样板戏电影中的女性形象研究（节选）  
（08/2）

抢枪专题（08/9）

王广宇 江西红卫兵抢枪和毛主席批示（史林一叶）

中共中央文革小组办事机构总支委员会通报（故纸堆）

刘祖万 紧急！红卫兵涌向军火库（文摘）

周总理指示（故纸堆）

张传俊 我所经历的文革抢枪事件（蓦然回首）

卜伟华 关于文革中的夺枪问题（文摘）

### 早期红卫兵专题（08/10）

阎阳生 清华附中红卫兵 100 天（史林一叶）

卜伟华 阎阳生《清华附中红卫兵 100 天》若干史实辨正（闲读偶记）

刘 双 毛泽东对联动的捉与放（史林一叶）

董胜利 关于西安红色恐怖队的口述回忆（蓦然回首）

陈益南 我见过的“红色政权保卫军”（文摘）

### 书评与序跋

徐友渔 是文化的革命还是武斗？——何蜀《为毛主席而战——文革重庆大武斗实录》序（08/2）

徐海亮 从《深翻》看老外笔下的农村文革（08/2）

余汝信 是谁要打倒张爱萍？（08/3）

周伦佐 青春琴弦上的叛逆声音（08/4）

周伦佑 破镜中成长的诗歌青春（08/4）

附录：周伦佑文革时期诗四首（08/4）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沈迈克 《毛泽东最后的革命》序言（08/5）

吴茂华 现实与荒诞——读周孜仁《红卫兵小报主编自述》（08/5）

阎长贵 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08/8）

### 闲读偶记

鲁 丁 文革研究要关注平民百姓——《记忆》第二期读后 ( 08/3 )

顾 土 文革史中的“虚史料”现象 ( 08/8 )

#### 风云人物

迟泽厚 一腔悲愤谁诉——记丁盛同志晚年 ( 08/2 )

丁 盛 与马、徐、王谈话的真情及我的自白 ( 08/2 )

#### 史林一叶

周孜仁 毛泽东巨像：从造到毁 ( 08/3 )

王广宇 我是“二月逆流”会议记录稿的唯一见证人 ( 08/7 )

李 辉 齐白石与中国画的文革遭际 ( 08/7 )

王广宇 安亭事件前后和王洪文进京 ( 08/8 )

顾训中 关于 1967 年 1 月王洪文进京及上海权力机构名称变化的史实考订 ( 08/8 )

白 磊 关于白瑞生“国民党特务”案的采访记录 ( 08/8 )

#### 蓦然回首

李木森 令人震惊的“一〇·二七”事件 ( 08/2 )

曾国一 险遭镇压：一个摘帽右派的文化历险 ( 08/3 )

方子奋 我被抓上“一打三反”公判大会 ( 08/5 )

谢声显 王教授的噩梦 ( 08/5 )

李汝高 一个“从宽”典型的悲剧 ( 08/6 )

#### 昨日心迹

陈懋智 重庆武斗见闻日记（一）( 08/3 )

陈懋智 重庆武斗见闻日记（二）( 08/4 )

陈懋智 重庆武斗见闻日记（三）（08/5）

陈懋智 重庆武斗见闻日记（四）（08/6）

陈懋智 重庆武斗见闻日记（五）（08/7）

## 文摘

李 辉 初澜批“黑画”文章何以“夭折”（08/6）

叶维丽 有笔债……（08/6）

陈东林 毛泽东是否事先知道江青组织批判《海瑞罢官》（08/8）

徐友渔 为三千六百万饿殍立墓碑（08/8）

王保春、王文耀 陈伯达错捕王广宇（08/9）

陈冀德 “阴谋文艺”遭遇阴谋记——《朝霞》事件（08/10）

## 简讯

余汝信 《落难英雄——丁盛将军回忆录》公开出版（08/2）

唐少杰 《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简介（08/2）

樵 余 重庆文革墓群近 30 年简况（08/2）

宇 峰 北京部分学者研讨华国锋主政历史（08/4）

湘 宾 《青春无痕》已被韩国购买版权（08/4）

宗 迅 介绍几种电子刊物（08/5）

樵 余 “文革第一文艺刊物”《朝霞》主编陈冀德回忆录《生逢其时》出版  
（08/5）

渔歌子 原“中央文革记者”邢文举的回忆值得一读（08/5）

舒 云 邱会作将军铜像在家乡揭幕（08/6）

樵 余 陈英茨遗著《陈永贵本事》正式出版（08/6）

宗 迅 李振盛的文革纪实影展在西班牙展出（08/6）

樵 余 重庆医科大学塑造毛泽东巨像引发争议 ( 08/8 )

## 故纸堆

中央直属文艺系统戏剧口批判组：杂技艺术的新生面 ( 08/2 )

人民日报讯 北京工农兵体育学院通过实践改革了三个体育项目 ( 08/3 )

1976 年复旦大学中文系工农兵学员给一个外国留学生的大字报 ( 08/4 )

杨老玖 了解平民生活的文革文献——介绍上海市革委会《接待通讯》小资料 ( 08/5 )

姜东平 对一个自杀未遂者的批斗会记录 ( 08/5 )

中国革命音协、中国音乐出版社全体革命同志 谁反对我们歌颂毛主席，谁就是我们的敌人 ( 08/5 )

二外红卫兵九一联合兵团 鲁迅先生访问记 ( 08/8 )

## 小资料

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名单 ( 08/2 )

程明远、刘秀山简介 ( 08/2 )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名单 ( 08/3 )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名单 ( 08/4 )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名单 ( 08/5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常委名单 ( 08/6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常委名单（**补充修订版**）( 08/7 )

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名单 ( 08/8 )

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名单 ( 08/9 )

## 编读往来

## 纠错

- 丁东纠一期之错（08/2）
- 余汝信纠三期之误（08/4）
- [丁东](#)纠八期之错（08/9）

### 建议

- 余汝信建议本刊所载资料应说明来源出处（08/4）
- 丁东建议讨论《墓碑》（08/7）
- [袁伟时](#)建议超级链接（08/9）

### 赐稿

- 单少杰惠赐大作《宗凤鸣先生谈赵紫阳思想》（08/4）
- Michael.schoenhals（沈迈克）介绍加拿大文革研究学者，西蒙弗雷泽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历史系副教授杰米·布朗（Jeremy Brown）（08/7）
- Michael.schoenhals（沈迈克）提供保定革委会名单（08/8）
- Jeremy Brown（周杰荣）提供天津革委会名单（08/8）

### 问答

- 答散木询问《文革编年纪事》（08/2）
- 答赵诚询问江青找面首问题（08/3）
- 答胡小水询问王年一的《军队一·一三事件目睹记》一文（08/3）
- 阎长贵答胡小水（08/4）
- 答徐泥询问国史笔谈事宜（08/7）

### 感想

- 陈家琪谈文革（08/4）
- 王里谈文革（08/5）
- 庄女士读后感（08/5）
- 庄女士对《[文革历史研究](#)中的误区》的质疑（08/6）
- [庄女士](#)关于文革中“疯狂的冲动”的看法。（08/6）
- 顾训中谈吴小龙（08/8）

### 励言

- 友人来信（08/2）
- 杜光、阎长贵、胡甫臣赐函（08/2）
- 瑞典汉学家 Michael.schoenhals（沈迈克）赐函（08/3）

- 向宏赠七律：读《记忆》有感（08/5）
- 杜光赠《八十感言》（08/3）

### 编者的话

- 编者致作者（08/5）
- 年终寄语（08/10）